轉變中的香港：1991年至2011年香港女性的狀況

圖像摘要報告

2013年2月

黎文燕、Louisa Mitchell、戴高禮





思匯政策研究所簡介

思匯政策研究所成立 2000 年 10 月，是香港一所獨立非牟利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擁有跨越中港兩地和各界別的網絡，與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商界、媒體、非政府組織都有聯繫。思匯政策研究所對空氣質素、能源、城市規劃、氣候變化、自然保育、水資源、管治、政制發展、平等機會、貧窮及婦女等課題擁有豐富的研究經驗。思匯政策研究所網址：http://www.civic-exchange.org

作者簡介

黎文燕是思匯政策研究所的項目經理及插畫師。除了參與城市設計和宜居性議題的工作外，她亦為報告製作資訊圖像和插圖。她對方便讀者和以人性化方式展示資訊有著濃厚興趣。黎文燕於 2009 年獲得國際規劃碩士，並於 2004 年取得政治學和藝術創作文學/美術學士。

Louisa Mitchell 是定居香港的自由撰稿人和社會政策研究員。她曾經是英國著名智庫 Policy Exchange 的研究總監。Louisa Mitchell 曾為《南華早報》及《金融時報》撰稿。在此之前，她是倫敦一項國際環境獎項計劃 The Whitley Fund for Nature 的總監，以及香港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的首任總監。她的首份工作是有關投資銀行業務。Louisa Mitchell 為劍橋大學榮譽文學士以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學碩士。

戴高禮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家，他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以及公共行政管理碩士課程總監。戴高禮是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主任，該計劃自 1988 年起長期研究香港市民由殖民地回歸中國的轉變。他亦是香港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在 1996 年至 2006 年期間，任經濟學人智庫的「香港國家報告和國家預測」專家作者，以及於 2000 年至 2008 年間為《英文虎報》擔任每週專欄作家。他撰寫了 12 本書或電子書，75 個書籍章節或經審閱的期刊論文，逾 200 份受委託的研究報告和研究論文，並進行了超過 120 項民意調查，主要圍繞香港政治發展方面，但亦有關於環境的嶄新調查。

前言及鳴謝

香港女性面對不少錯綜複雜的議題，當中有些尤其涉及性別差異，而且大部份均屬迫切的社會議題，例如青少年懷孕個案有增無減、新移民婦女來港後難以融入社會，以至香港人口急劇老化等等。要解決這些議題，有賴公私營機構群策群力，但婦女基金會深信，若要各界的努力用得其所，背後必須有客觀和可靠的數據支持，以深入了解問題的根源所在。

香港素來缺乏客觀和尖銳的性別研究，因此婦女基金會一向率先而行，致力填補這方面的重要缺口。回顧2006年，婦女基金會公佈了一項名為《香港女性現況》的突破性研究，致力探討香港女性的概況。承接這項研究，我們於2008年開展了一項為期18個月的計劃，透過焦點小組、個人專訪和公開討論，邀請持分者提供意見，務求加深了解香港婦女和少女所面對的障礙。

為了加強各界關注性別議題，我們更於2010年在《南華早報》和《信報》網站推出專欄，每月邀請香港和國際賢達執筆，發表一篇文章，內容環繞香港各項與婦女息息相關的主題，以及香港的性別議題。

自於2006年發表首項研究以來，我們目睹香港社會變化不斷，有些範疇得見改善，有些原地踏步，有些更每況愈下，例如香港的堅尼系數日趨惡化，更多市民活在貧窮線下；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女性壽命大幅超越男性），為福利計劃、房屋和保健服務增添壓力；但另一方面，女性出任政治要職或晉身企業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比率，卻無顯著進展。執筆之時，喜見香港政府新班子有認真處理這些議題的跡象，令人鼓舞，而且越來越多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承擔的公司，積極參與和支持非政府機構的工作，以幫助處於弱勢的一群，也令人感到樂觀。我們期望本身的研究，能有助找出在目前社會福利和教育範疇的政策和計劃中有的挑戰和缺失，務求推動所有持分者改善策略和資源分配，使情況有所好轉。我們亦希望本身的研究能成為有用的資源，以供國際和香港人權組織，以及其他機構撰寫影子報告，並提交予聯合國下一次將於2014年舉行的聆訊，審視香港遵守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的狀況。

繼2006和2008年發表的研究，婦女基金會於2010年展開了一系列全新的量化和質化研究，分別與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思匯政策研究所合作。

這份報告是我們與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合作成果。我們非常感謝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出色工作，特別是戴高禮、葉溵溵、黎文燕、Louisa Mitchell、姚遠和曾錦倫。我們也感謝思匯政策研究所前行政總監、現任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女士特別抽空，分享其真知灼見，協助製作這份報告。

我們也要向高盛集團不少員工致謝，因為他們通過高盛捐贈慈善基金，慷慨奉獻出不少時間、意見和金錢，支持這個研究項目。

此外，我們謹此感謝下列人士為我們提供寶貴意見、鼓勵和專業知識，他們包括：Adele Rossi Brunner、Rachel Cartland、張妙清、蔡玉萍、Marissa Dean、方敏生、Staci Ford、Jackie Kim、Estella Huang Lung、Melissa Petros、Samantha Thompson、黃健偉、胡紅玉和姚正宇。我們亦十分感謝婦女基金會研究主任莫麗莎。

最後，我們深明單憑討論，無法滿足香港最弱勢一群的需要，因此我們最大的希望，是這項研究能拋磚引玉，推動長遠而有系統的變革，驅使各界加倍努力，實現所需的轉變，令女性能夠全面參與香港社會。

婦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
Kay McArdle

婦女基金會行政總裁
周素媚

報告系列說明

思匯政策研究所與婦女基金會合作進行是項研究，旨在透過分析歷史數據，了解過去20年女性地位的轉變。我們採用了具開創性的研究方法，同時採納了主觀和客觀的數據，以便能更全面地了解女性狀況的改變。客觀數據來自政府官方數據、學術研究和灰色文獻，而主觀數據則來自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民意調查數據。

是項研究共有三份報告：一份涵蓋客觀數據、一份涵蓋主觀數據，以及一份輯錄了此兩份報告重點、較方便大眾閱覽的摘要報告。

- 《轉變中的香港：1991 年至 2011 年女性組別分析》：思匯政策研究所委託社會政策研究員 Louisa Mitchell 檢視香港特區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學術研究和灰色文獻。Louisa Mitchell的研究結果和分析組成本研究的客觀部份，該報告長達250頁，題為《轉變中的香港：1991 年至 2011 年女性組別分析》。報告描繪了今天不同年齡的典型女性面貌，包括 15 歲至 19 歲、20 歲至 29 歲、30 歲至 49 歲、50 歲至 59 歲和逾 60 歲，並勾勒出非典型女性群體的生活軌跡，同時就多個範疇進行比較，如教育、收入、婚姻狀況和職業，及將今天的女性和男性、以及今天的女性與 20 年前的女性進行對比。

  特別一提的是，這項研究在香港特區政府人口普查數據（特別是涉及到失業）造假新聞出現前已經完成，而在本報告出版之時，香港特區政府仍在調查事件，因此在閱讀相關數據和分析時需要注意這一點。

- 《轉變中的香港：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本研究的主觀部份來自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民意調查的數據分析。思匯政策研究所與香港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戴高禮教授及張佩琪女士，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兩位統計學研究生檢視了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自1994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在該題為《轉變中的香港：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的131頁報告中，通過回歸分析統計數據和時間組別（1994 年至 2000 年、2000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至 2010 年），揭示香港人對中國國慶日的感覺、個人關注領域、政治和公民參與等方面的態度和行為轉變。

- 《轉變中的香港：1991 年至 2011年香港女性的狀況圖像摘要報告》：由思匯政策研究所黎文燕製作的圖像摘要報告輯錄了 Louisa Mitchell 報告（第一部份）的重點，以及戴高禮教授報告（第二部份）中有關性別的要點，摘要報告末部亦載有一系列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建議。摘要報告備有中文版。

我們期望是項研究能加深對香港社會面貌轉變的理解，決策者從而可以制定滿足香港人需要的政策，其中可能包括一些針對性別的政策和/或措施。就人們一般態度和行為轉變（即與性別無關）的詳細分析，可閱讀《轉變中的香港：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完整報告。摘要報告僅輯錄與性別有關的數據和分析。

思匯政策研究所
2013 年 2 月

目錄

其他報告(英文版)可到 www.civic-exchange.org/wp/201302gender_en 下載。

資料匣 1：關於本報告之數據

1. 大部份統計數據來自 2011 年，但部份領域採用了 2010 年或更早的數據。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將此與 1991 年的數據作比較，然而，如 1991 年的數據並不存在或未能作直接比，我們會選取接近的替代日期。我們採用了政府統計處四個主要數據來源，並在整個文本中以下列符號表示：

   ɸ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1 年），《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表》，香港：香港政府。

   θ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1 年），《2011 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表》，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us2011.gov.hk/tc/main-table.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ψ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2 年），《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2 年版》，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80_tc.jsp?productCode=B1130303（瀏覽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ɨ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2 年），《香港人口生命表2006-2041》，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90_tc.jsp?productCode=B1120016（瀏覽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2.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數據來自 1994 年至 2010 年間進行的調查，並分為三個時間組別進行分析，分別為 1994 年至 2000 年、2001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至 2010 年。

3.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幣值為港元。

4. 除非另有說明，第一部份所有數據指的是該頁所顯示的年齡組別。

5. 所有人口普查衍生的數據由於原始數據已被約整，其百份比被約整至最接近的 1%。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數據，其百份比顯示為一位小數點，95% 置信區間的誤差範圍少於 1%。詳情請參閱註 16。

6. 有關本摘要報告所使用的術語和分類的詳細解釋，請參閱第37頁「詞彙和定義」。

1. 1991年至2011年女性組別分析

15歲、25歲、35歲、45歲、55歲或65歲的典型女性有何特點？她的教育程度為何？職業為何？收入多少？她結婚了嗎？她有孩子嗎？相比20年前的同齡女性，今天的她過得如何？相比同齡的典型男性她又過得如何？在本摘要報告的第一部份，我們將根據 Louisa Mitchell 的報告《轉變中的香港：1991年至2011年女性組別分析》，探討由15歲至60歲以上的「典型」女性在香港的社會經濟概況。

Louisa Mitchell 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按公開可用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次級資料分析，[1] 結合學術研究以及回顧「灰色文獻」（即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市場研究機構的調查、媒體文章和政策講辭）。在整個報告中大量引用了多項最為相關及最近的調查，特別是2008年香港大學為中央政策組進行的家庭價值調查，[2] 以及婦女事務委員會委託進行、於2011年發表的對女性在家庭和職場的態度調查。[3]

我們以年齡組別勾勒報告框架，是因為香港上世紀的豐富歷史和急速變化，意味今天60歲或以上的女性概況明顯與20、30多歲的女性不同。

為展示社會經濟概況，報告還會提及跨越年齡組別的政策重點領域包括種族、教育程度、就業和收入、婚姻和家庭、房屋類型、住戶人數、犯罪活動和政治參與。[4]

主要調查結果

- 長者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組別，相比其他年齡組別，很大部份長者顯然欠缺充足技術和資源，並更有可能生活在貧困中。四份之一60歲或以上長者不分性別申領綜援，但有社福機構估計，另外約有四份之一60歲或以上長者雖合乎資格，但並沒有申領綜援。在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女性明顯比男性差。雖然官方公佈的長者犯罪案件的數字仍然非常小，但高匱乏之水平可能促使長者犯罪率不成比例地上升。

- 中年男性組別在職業和收入方面表現優異，但中年女性的情況並非如此。女性工資顯著遜於男性，這是由於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為主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女性裝備平均較弱。

- 相比其長輩，30多歲和更年輕的女性在趕上男性的教育程度和工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學科、職業和行業間的性別隔離現象仍然存在。然而，隨著這些進展而來的是相當大的種族和階級分層現象，（20歲至39歲組別的兩性收入差距主要源自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香港缺乏其他托兒服務選擇是促成對外傭依賴的一個原因。

- 主要是由於外籍家庭傭工的湧入，現在非中國人的少數族裔佔20歲至29歲女性組別的18%，以及30歲至39歲女性組別的21%。然而，我們對家庭傭工的了解相對少，更遑論在香港的其他少數族裔。

- 儘管中產家庭多聘用家庭傭工，女性仍需要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求。婚後（並同時暗示生育後）勞動人口參與率急劇下降，連同出生率下降和越來越多人推遲生育，顯示女性在建立家庭時需承擔更大的機會成本。

- 受到全球化影響，相互衝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價值觀更深入民心，並扯著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居於更小的家庭，更有可能缺乏其中一位家長的照顧（可能是因離婚或在海外工作），並更長時間與父母同住。這些變化和衝突影響到家庭結構、房屋、福利、稅制和無數其他政策領域。

- 20 多歲這個年齡組別的男女在性別平等方面做得最好，但在經濟方面，儘管兩性的教育程度有重大提升，但年輕人在過去 20 年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停滯不前（過去 10 年實際上在下降）。

- 今天的青少女可以享有 12 年平等免費教育的機會，但同時社會對她們的表現抱有更高的期望。她們在多個方面表現良好，包括犯罪率下降，而且極少數青少女成為人母。被呈報吸毒個案在 2000 年代初達到高峰，但自此一直下降。然而，工資、職業和失業率數據意味青少年離校生的經濟機會可能正縮小。

- 大體而言，女性在實現平等工作間仍然有一段距離，特別是在擔任領導角色。儘管在 2011 年女性勞動力的比例已穩步上升至近半，然而明顯只有少數女性擔任私營、公營和學術部門的高級職位。人口普查的收入和職業數據以及最近幾個獨立研究亦反映這一點。在 30 歲以上的各年齡組別，女性表現仍然弱於其同齡男性，此差距隨年齡上升而擴大。



很有可能 20 歲出頭結婚，並在 20 歲至 25 歲左右首次生育。ψ

可能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間從事製造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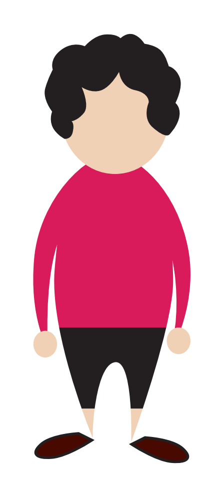
沒有接受過教育或只有小學程度（70%）。ψ

退休人士（75%）或料理家務者（16%），尤其是 65 歲後。ψ

中國人（99%）。θ

如現為60歲，預期可活至88.4歲。ǂ

生於 1920 年代至 1951 年。



60歲至約90歲的典型女性

不大可能在 2011 年區議會（61歲或以上人口的 18%，2011 年）或2008 年立法會（61 歲或以上人口的 26%，2008 年）選舉中投票。ψ

與配偶及/或子女同住、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45%）、居於新界（44%）。θ ψ

從未被捕或判刑，亦非被呈報吸毒人士 。ψ

概況

自 1991 年以來，60 歲或以上組別的人數增長了78%，是繼 40歲至 59歲組別人數增長最快的第二個組別。60 歲或以上典型女性屬戰後內地移民和嬰兒潮一代。[5] 她成長於實行一夫多妻制和妹仔（女奴）的時代，遠遠早於免費強迫教育實施之時。家裡的資源很有可能用於其兄弟的教育上，而雖然她可能曾於香港輕工業繁榮時期在工廠工作，[6] 她人生的焦點仍是婚姻和生育。[7] 在 2011 年，60 歲或以上女性中只有 3% 從未結婚，而 70% 只有小學程度或沒有接受過教育。因此，當中許多女性缺乏技能應對轉型至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大部份 60 歲或以上組別女性在 2011 年為退休人士或料理家務者（沒有呈報的臨時工除外）。

在仍然正式上班的 8% 當中，52%從事非技術工作（相比男性的 29%），而只有21%為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男性為36%）。在2011年，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6,800（男性為$10,000）。按實際價值計算，60 歲或以上人口的收入自 1991 年以來穩步上升，但仍低於人口平均水平。女性在這方面顯然沒有趕上，36% 女性的收入低於 $6,000，遠低於整體工資中位數。此匱乏水平可能解釋了長者犯案率上升，雖然實際數字仍然很小，但上升的幅度令人感到不安。

60 歲或以上的女性也經歷了多代家庭同住的衰落。一項 2008 年的家庭價值觀調查發現，65 歲或以上受訪者大多較喜歡大家庭結構，[8] 但其實在 2011 年逾一半居於2或3人家庭，而 16% 更是獨居。

註：除非另有說明，所有 60 歲或以上女性的資料為 2011 年。有關數據來源請參閱資料匣 1，第 7 頁。有關定義詞彙請參見第 3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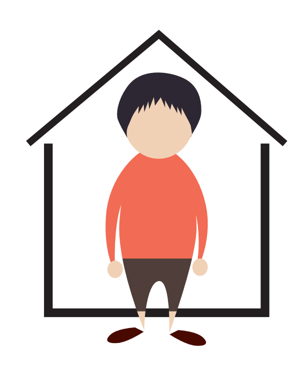
另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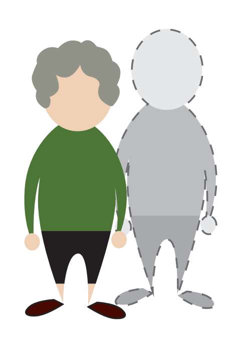
殘疾人士（25%，2007年），領取綜援高齡津貼（15%，2011年）。ψ



住在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19%）。θ



獨居 （≥65歲，16%）。ψ



喪偶、分居或離婚（45%）。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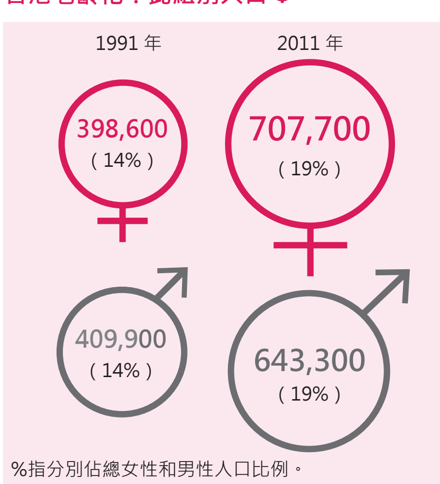
就業（8%，2011年）於零售、金融或護理業，每月工資中位數 $6,800。ψ



在2008年立法會（此組別的27%，2008年）及2011年區議會（此組別的26%，2011年）選舉中投票。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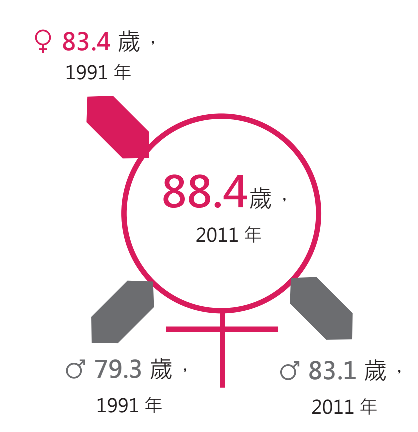
主要數據比較

香港老齡化：此組別人口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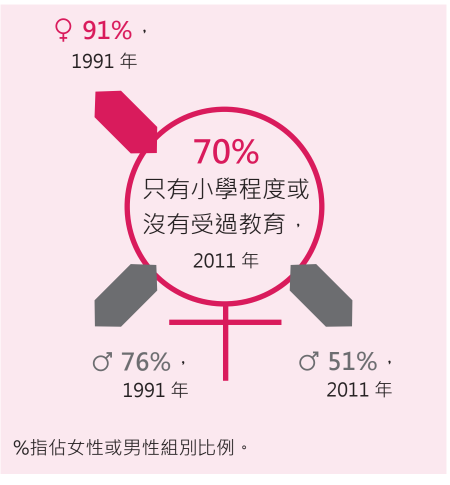


%指分別佔總女性和男性人口比例。

更長壽：60 歲人士預計可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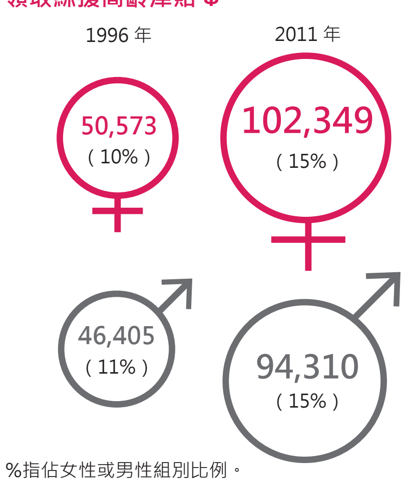


錯過的機會：教育 ψ 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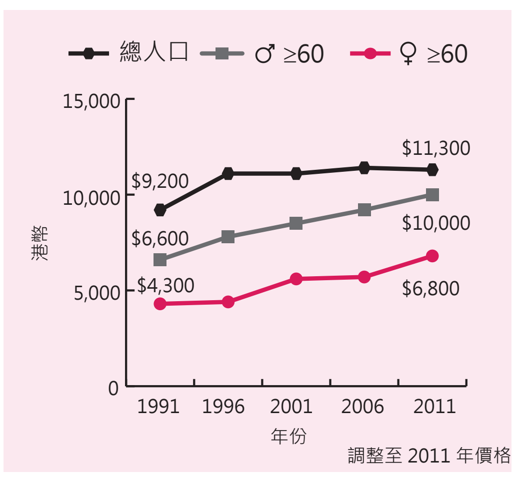
%指佔女性或男性組別比例。

領取綜援高齡津貼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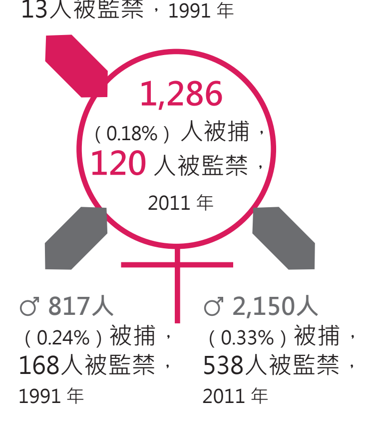
%指佔女性或男性組別比例。

貧窮女性：每月工資中位數 ψ



調整至 2011 年價格

長者犯罪率上升 ψ



40-59

25歲左右結婚；在20歲後期首次生育。目前已婚（76%）。ψ

50歲至59歲年齡組別，初中（20%）或高中（34%）程度。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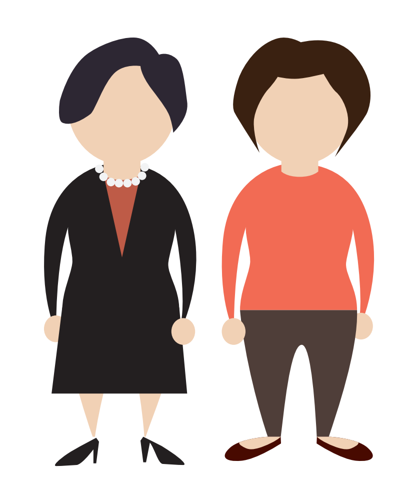
全職就業於零售（20%）、進出口貿易（16%）、護理（33%）或金融（21%）業。ψ

40歲至49歲年齡組別，高中（46%）或大專（23%）程度。ψ

非技術工人（30%）、文員（20%）或銷售人員（19%），收入<$6,000，尤其是50歲至59歲 ψ
或
經理或專業人員（20%），收入>$20,000，尤其是40歲至49歲。ψ

中國人（93%）。θ

生於1952年至1971年。



40歲至59歲的典型女性
高度兩極化組別

不大可能在2011年區議會（41歲至60歲的22%）和2008年立法會（41歲至60歲的30%）選舉中投票。ψ

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52%）、居於新界（53%）、住在3至4人家庭（57%）、與配偶及/或子女同住（2011年）。θ ψ

從未被捕或判刑，亦非被呈報吸毒人士。ψ

概況

此年齡組別橫跨於1971年推出的六年免費強迫教育之時，該政策於1978年延長至九年。40歲出頭的因較年輕而受惠，但50多歲的就錯過了機會，這對此年齡組別女性的人生有深遠的影響：教育差距轉化為收入差距，因為較年輕和受過較好教育的女性更能成功轉型(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不過，兩個年齡組別的表現相比男性並不特別出色，男性的工資仍然明顯較高，並擔任經理和專業職位以及商業和公共部門的領導職務。

相比20年前，今天一般中年女性多是在職母親，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比例在1991年至2011年間由45%上升至64%。然而，從未結婚的女性比目前已婚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比例約為1.5倍。200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40歲至49歲的受訪者相對不支持「婚姻和生育是生命必經階段」這個看法。[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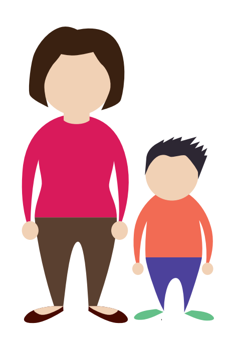
即使如此，大多數中年女性仍然秉承核心家庭這個傳統。雖然從來未婚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喪偶/離婚/分居女性和單親家長的絕對數目急劇上升，部份原因在於人口增長。儘管逾半單親家長為40多歲，在過去20年按其所佔年齡組別比例僅自低基數增長了幾個百份點。隨著漸多女性推遲生育，40歲至44歲女性的年齡組別生育率由1991年的每千名女性就有4.5名活產嬰，上升至2011年的12.7名。

註：除非另有說明，所有40歲至59歲女性的資料為2011年。有關數據來源請參閱資料匣1，第7頁。有關定義詞彙請參見第37頁。

另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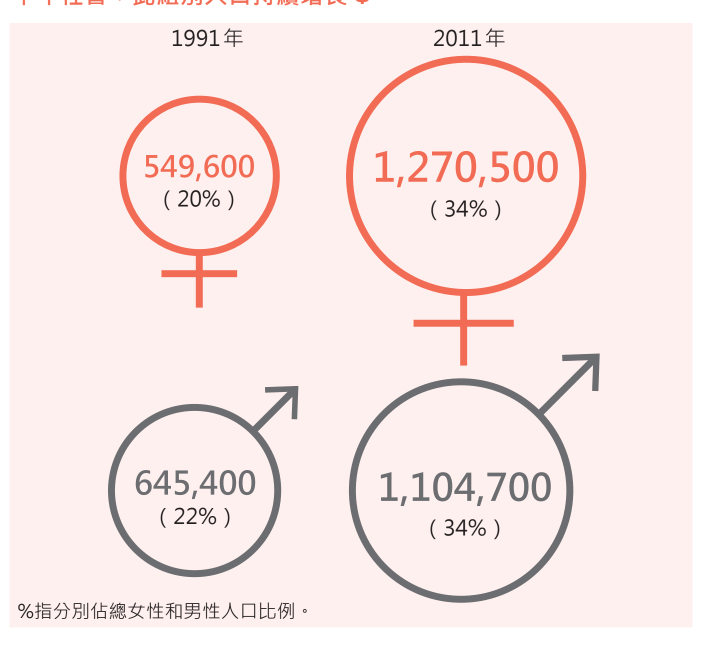
50 歲至 59 歲較 40 歲至 49 歲更有可能是料理家務者 (33%)。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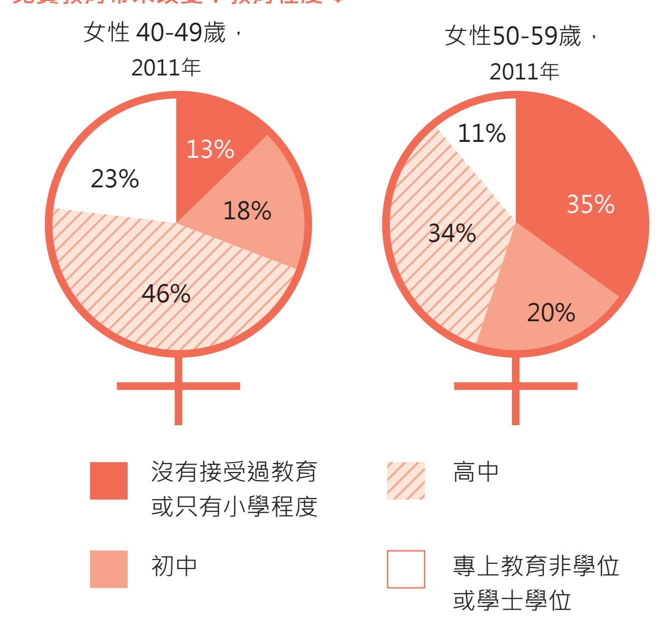
單親家長（52% 女性單親家長為 40 多歲）、就業或領取綜援、可能與另外1至2名家人同住一公屋單位。θ

主要數據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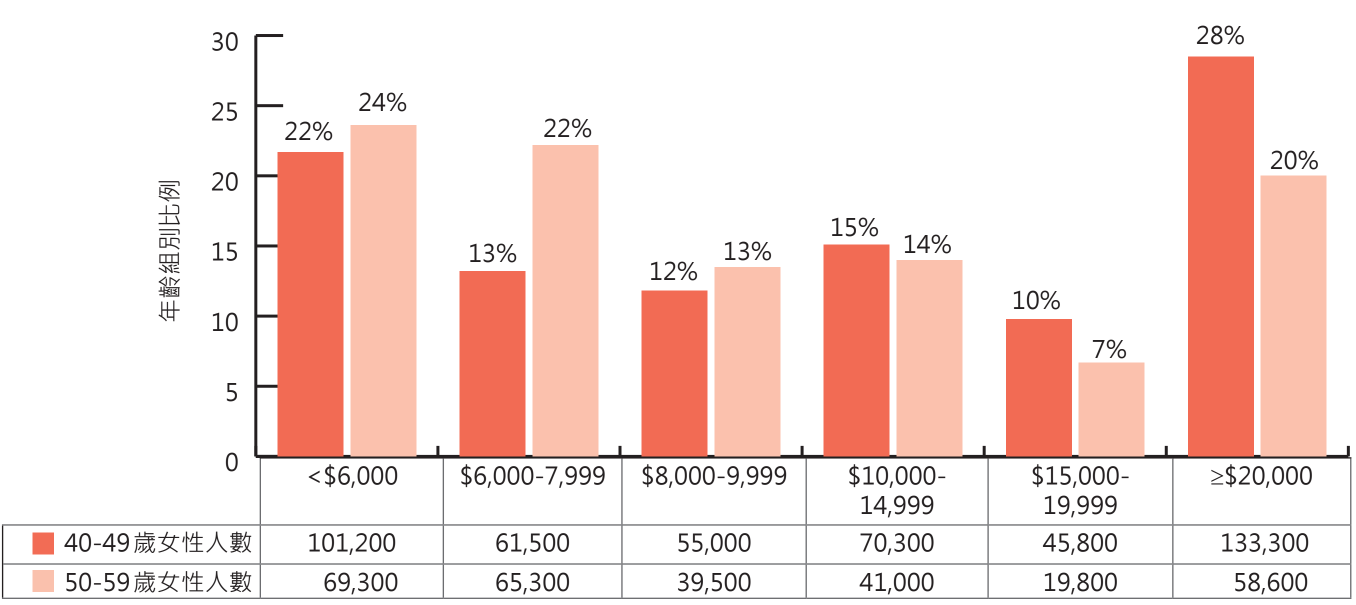
中年社會：此組別人口持續增長 ψ



免費教育帶來改變：教育程度 ψ



收入兩極化：2011 年按每月工資劃分的40歲至49歲和50歲至59歲就業女性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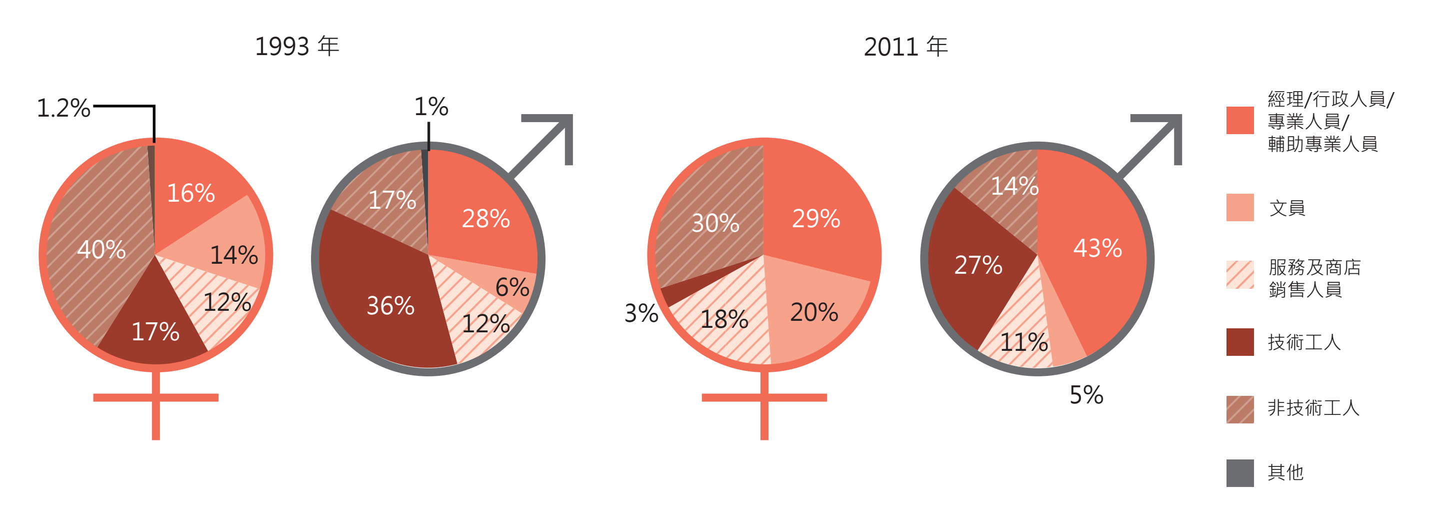


	<$6,000	$6,000-7,999	$8,000-9,999	$10,000-14,999	$15,000-19,999	≥$20,000
40-49歲女性人數	101,200	61,500	55,000	70,300	45,800	133,300
50-59歲女性人數	69,300	65,300	39,500	41,000	19,800	58,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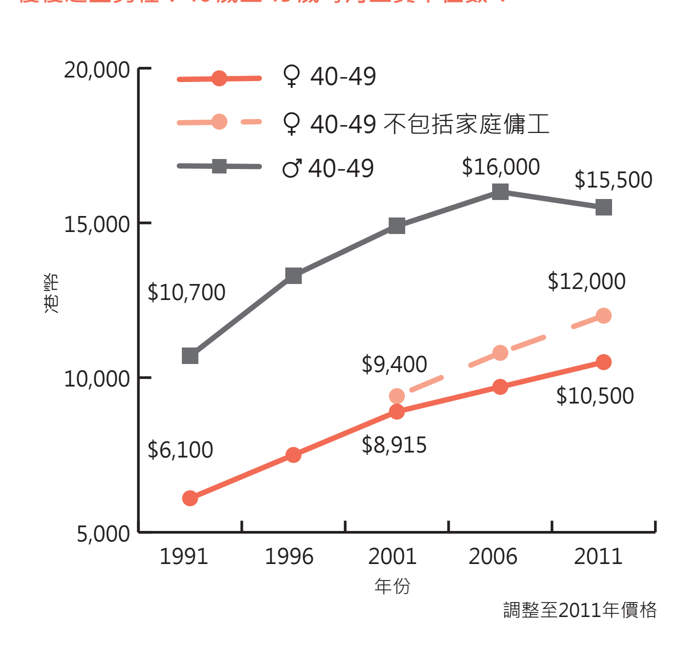
續下頁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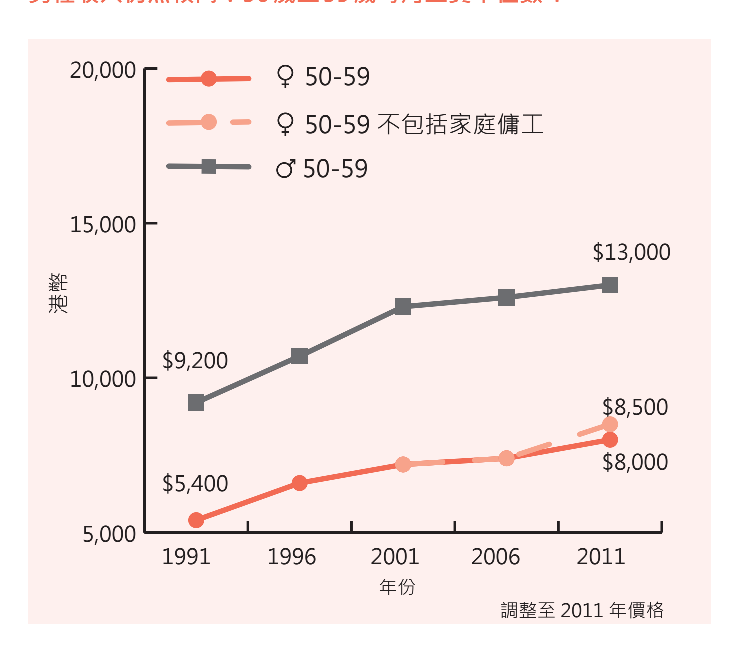
職業差距 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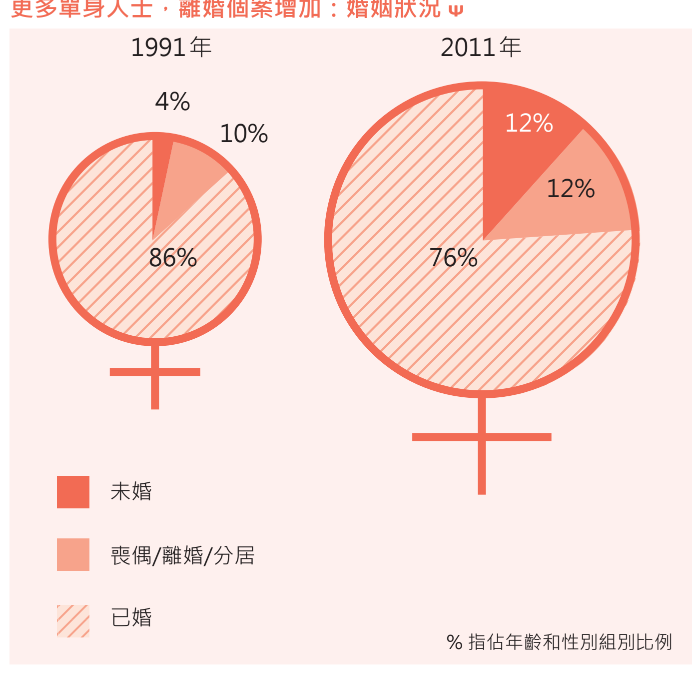
慢慢趕上男性：40歲至49歲每月工資中位數 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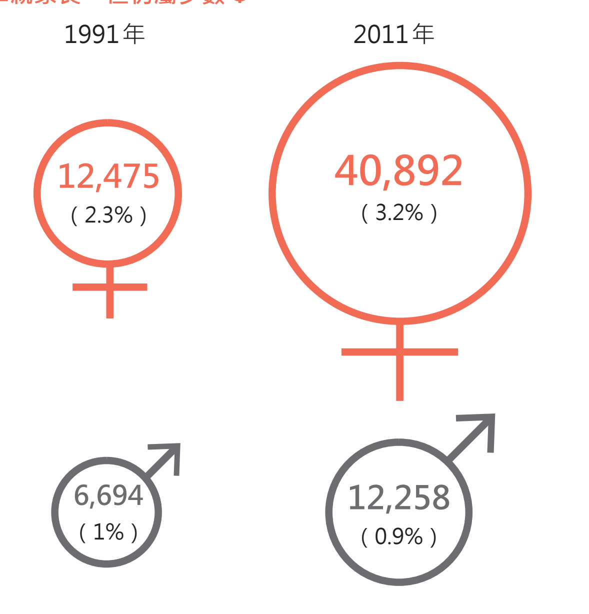
男性收入仍然較高：50歲至59歲每月工資中位數 ᴪ



更多單身人士，離婚個案增加：婚姻狀況 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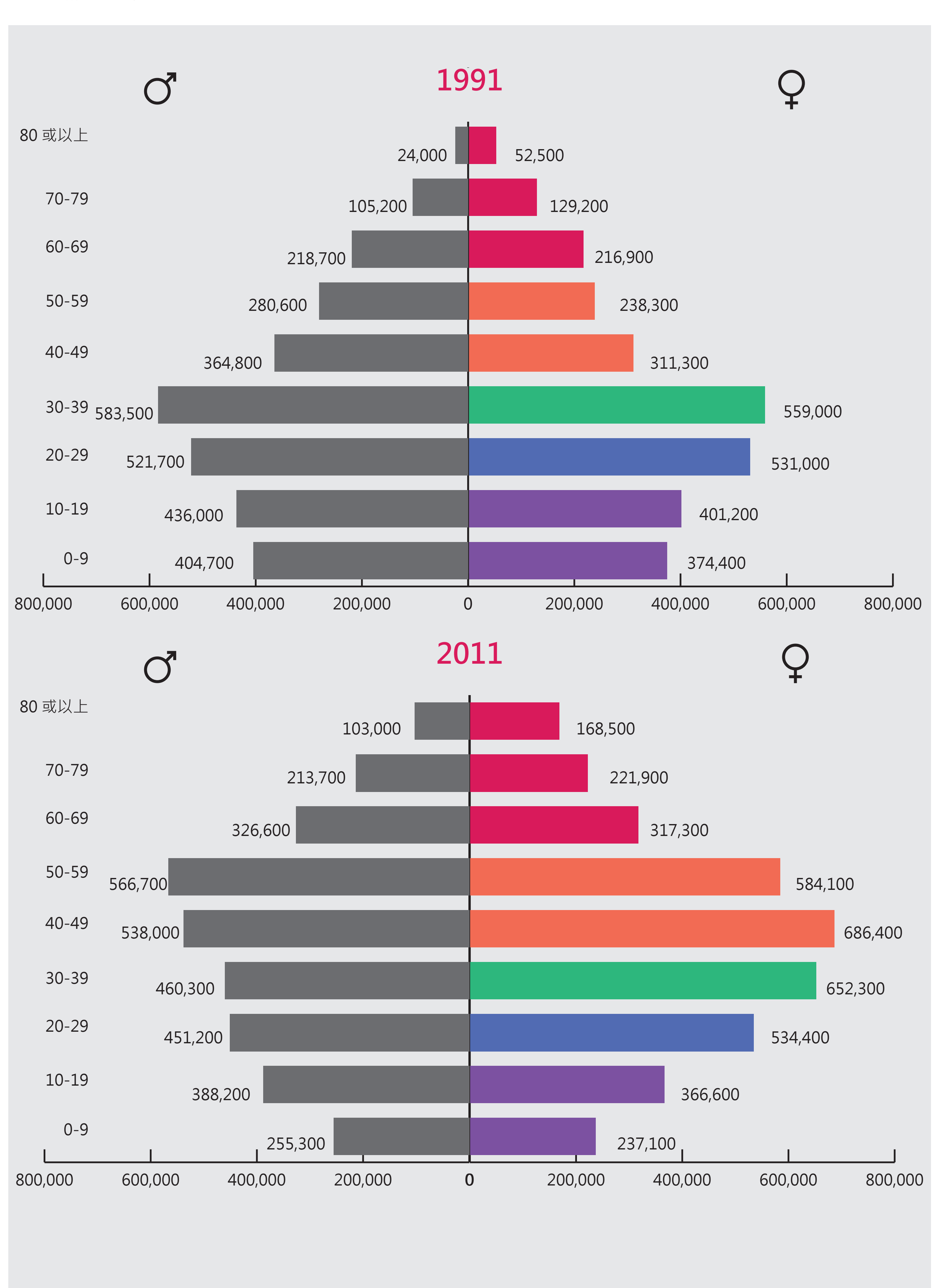
更多單親家長，但仍屬少數 ᴪ



% 指佔年齡和性別組別比例

資料匣 2：1991 年和 2011 年的人口金字塔

按年齡和性別劃分的年中人口 ψ



30-39

28 歲至 29 歲左右結婚，
並於 30 歲左右首次生育。ψ

高中（45%）或大專
（36%）程度；很大
可能為學士學位。ψ

全職就業，很有可能從事護
理（43%）、零售（15%）
或進出口貿易（16%）業。ψ

中國人（79%）。θ

經理/專業人員（37%），
每月收入 ≥$20,000，或
文員（21%），每月收入
$10,000-$14,999。ψ

生於1972年至1981年。



30歲至39歲的典型女性

不大可能在2008年立法會（31歲至 40
歲的18%）或2011年區議會（31歲至
40歲的11%）選舉中投票。ψ

住在3至4人家庭（51%）、住在私人永
久性房屋（64%）、居於新界（53%）、
與配偶及/或子女同住。θ ψ

從未被捕或判刑，亦非被
呈報吸毒人士。ψ

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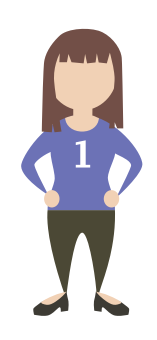
生於 1971 年後的 30 多歲典型女性受惠於 1990 年代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幾乎達到與其同齡男性同等良好教育程度，但在校園以外，性別不平等依然存在。30 多歲的女性周旋於現代和傳統價值觀並存的複雜社會，雖然其創富能力獲高度重視，但很多人仍然認為家庭應是她的重心。[10] 要同時滿足這兩項期望的難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越來越多女性推遲組織家庭。目前 30 多歲是生育的黃金年齡，此年齡組別生育率在過去 10 年實際上在上升。許多女性婚後仍然放棄工作，可能揭示香港長工時、缺乏家庭友善就業措施、男性沒有就家務責任作出同等貢獻，以及缺乏托兒服務（僱用全職家庭傭工除外）的問題。

外籍家庭傭工是此年齡組別的重要部份：其勞動力使中產女性經濟上取得進展，但傭工卻面對相當大的種族和階級不平等。此年齡組別的男性實際收入自 2001 年起下降，令此年齡組別兩性間的收入差距縮窄。然而，兩性收入仍然存在差距的另一原因主要源於家庭傭工的工資。另外，此年齡組別在族裔方面來說，是最多元的（76% 中國人、10% 菲律賓人、8% 印尼人），只是這些群體為較鮮為人知。這個年齡組別也包括了最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單程證持有人入境者，在 2011 年有 10,373 名女性入境（進一步分析請參閱第24頁）。

香港男性的內地妻子在港產子令香港的生育率由 2003 年低點上升至 2009 年有 6,500 名第一類嬰兒在香港出生。[11] 但是，2011 年總生育率為每名女性 1.2 名，仍遠低於替代率，並位居全球第二低。今天，育齡女性不想生育很多孩子，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她們不認為香港是家庭友善的地方。

註：除非另有說明，所有 30 歲至 39 歲女性的資料為 2011 年。有關數據來源請參閱資料匣 1，第 7 頁。有關定義詞彙請參見第 3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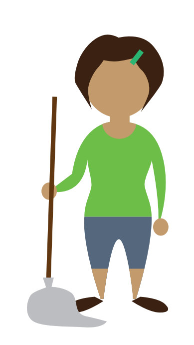
另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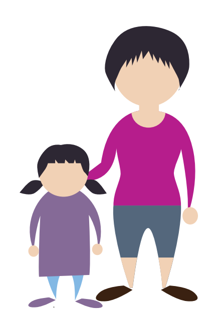
從未結婚（29%，2011年），沒有子女。ψ



最近從中國內地以單程證入境（2011年錄得10,373宗）。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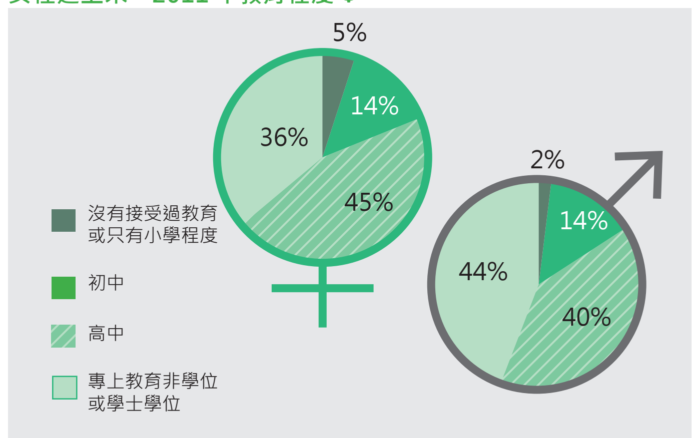
來自印尼或菲律賓的外籍家庭傭工（125,900人或此組別的19%），每月收入<$6,000。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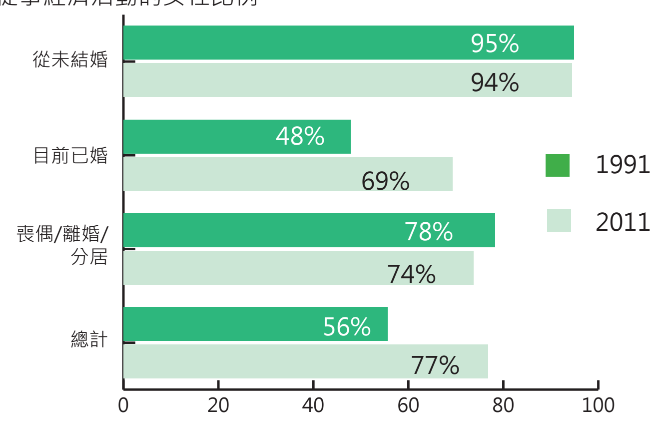
單親家長（3%，2011年），就業或領取綜援，可能住在2或3人家庭，公屋單位唯一租戶。θ

主要數據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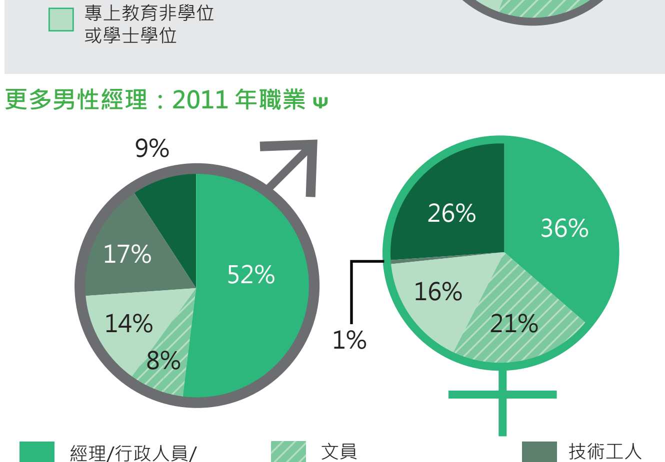
女性追上來：2011 年教育程度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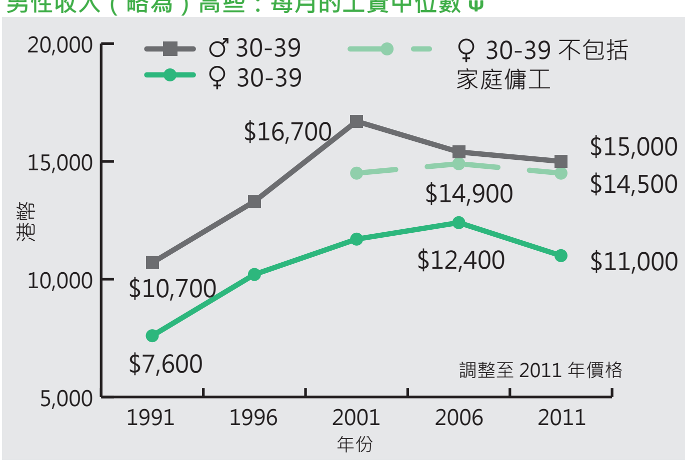
婚後勞動人口下降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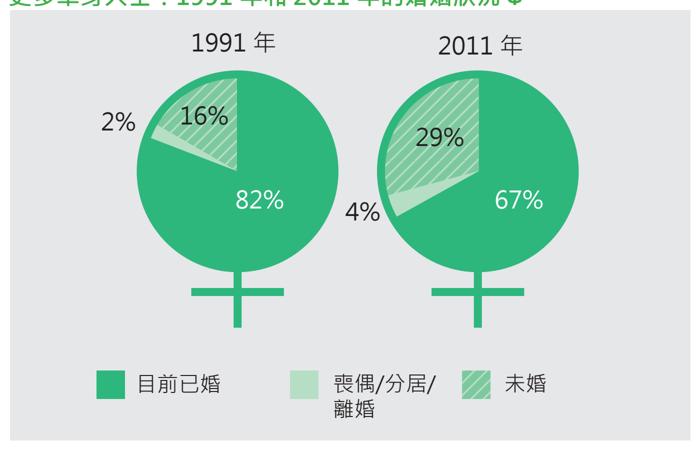
更多男性經理：2011 年職業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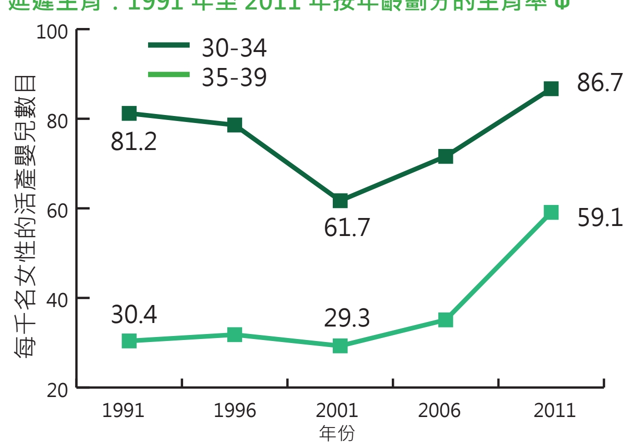
男性收入（略為）高些：每月的工資中位數 ψ



更多單身人士：1991 年和 2011 年的婚姻狀況 ψ



延遲生育：1991 年至 2011 年按年齡劃分的生育率 ψ



20-29

專上教育（53%），很大可能在大學修讀教育、文學、衛生、商業和管理或社會科學。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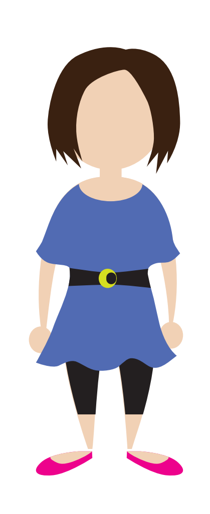
未婚（82%），沒有子女，可能同居。ψ

全職就業，很大可能從事護理（41%）、進出口貿易（16%）或零售 （15%） 業。 ψ

中國人（82%）。θ

非技術工人（21%），每月收入<$6,000；文員（28%）或輔助專業人員（21%），收入$8,000-$14,999。ψ

生於1982年至1991年。



20 歲至 29 歲的典型女性

不大可能在 2011 年區議會（21 歲至 30 歲的 9%）或 2008 年立法會（21 歲至 30 歲的 15%）選舉中投票。 ψ

住在4人家庭（33%）、與父母或配偶/子女同住、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51%）、居於新界（55%）。θ ψ

從未被捕或判刑，亦非被呈報吸毒人士。 ψ

概況

持有大專學歷或學位的 20 多歲女性平均幾乎達到與其同齡男性同等良好教育程度，並比 1991 年同齡女性的教育程度高得多。然而，性別化期望仍然影響其決定。儘管越來越多女性選讀醫科和牙醫，教育和科學這些領領域仍然如 1991 年般分別由女性和男性主導。繼之就業方面，年輕女性在護理業佔極大多數，顯示女性集中在護理行業如教育和護士以及個人服務業。目前這些差異並沒有影響收入：當家庭傭工（此組別的 17%）被剔除，年輕女性收入與男性相若。而這能否在其日後發展事業、婚姻和生育上持續是另外一個問題。然而，值得注意和令人不安的是，儘管年輕成年男女學歷不斷上升，其實質工資中位數自 1991 年起停滯不前，並實際上自 2001 年開始下降。

20 多歲女性相比 20 年前平均較少可能已婚或生育，較可能只與父母同住，但也可能與伴侶同居。雖然年輕女性傾向接受婚前同居，但她們對核心家庭的看法較其 40 歲至 59 歲的母親更理想化，她們當中較多人認為婚姻和生育是生命中的必經階段，較少人認為離婚是不可調和婚姻分歧的合適解決方案。[12]

如前文所述，較年長年齡組別犯罪率上升，21 歲至 29 歲的犯罪率自 1990 年代後期實際上下降了，特別是男性方面。雖然組別人口在 1996 年至 2011 間保持相對穩定，男性被捕人數從 10,092 名下降至 5,462 名，被監禁人數從 4,627 名下跌到 2,167 名。在同一時期被捕女性從 1,949 名下降至 1,695 名，被監禁人數從 1,937 名下降至 1,101 名。

註：除非另有說明，所有 20 歲至 29 歲女性的資料為 2011 年。有關數據來源請參閱資料匣 1，第7頁。有關定義詞彙請參見第 37 頁。

另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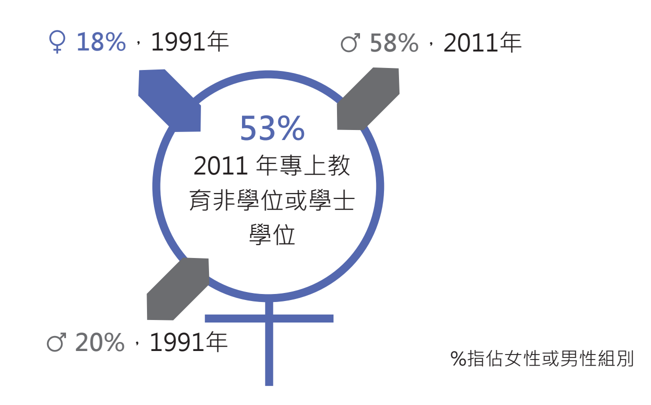
結婚年齡中位數為28.9歲，
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為 30 歲。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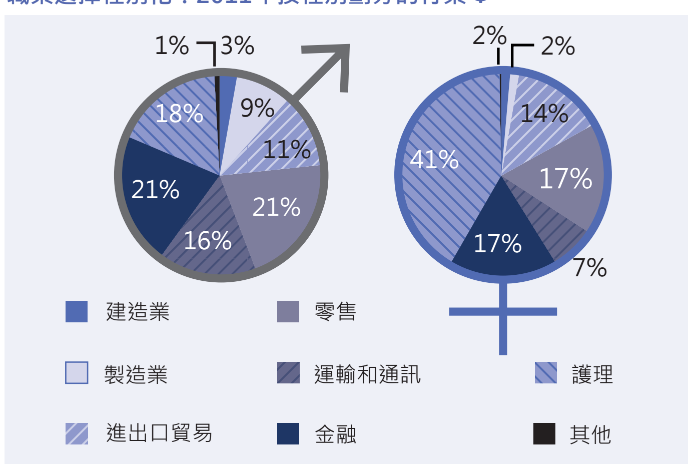
外籍家庭傭工（89,500 人或此組別的
16.7%），未婚，收入<$6,000。 ψ

主要數據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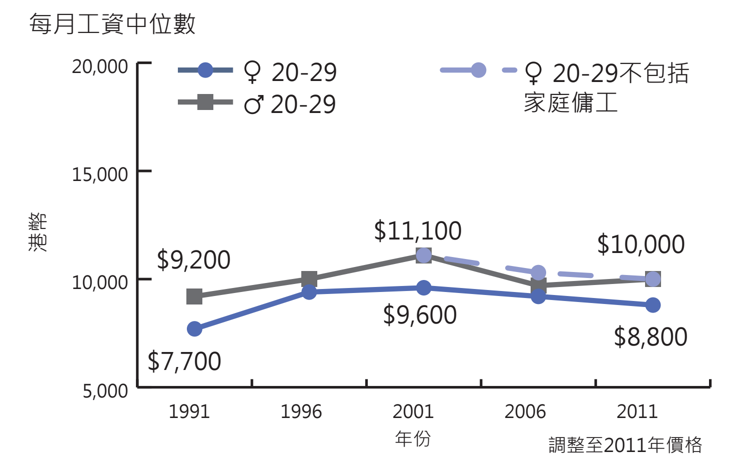
接近教育平等：教育程度 θ 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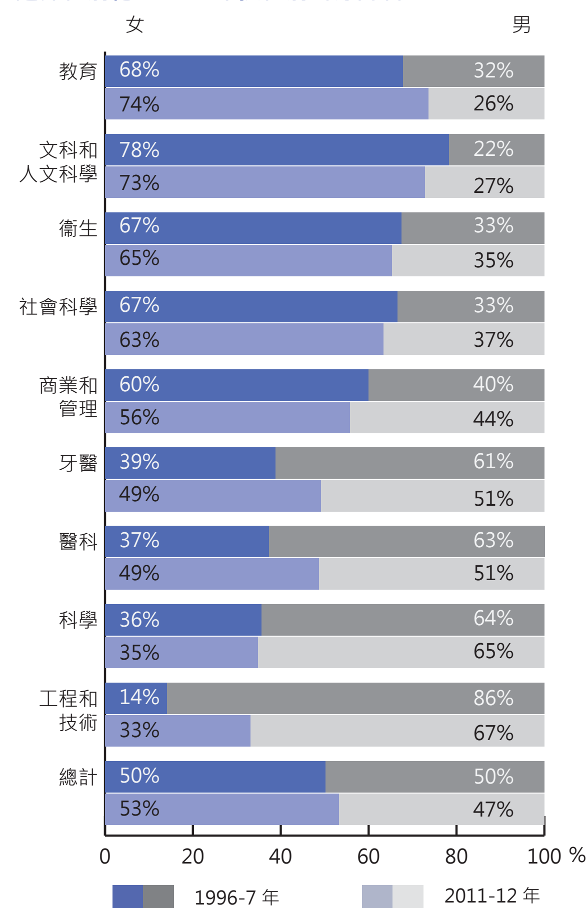
職業選擇性別化：2011年按性別劃分的行業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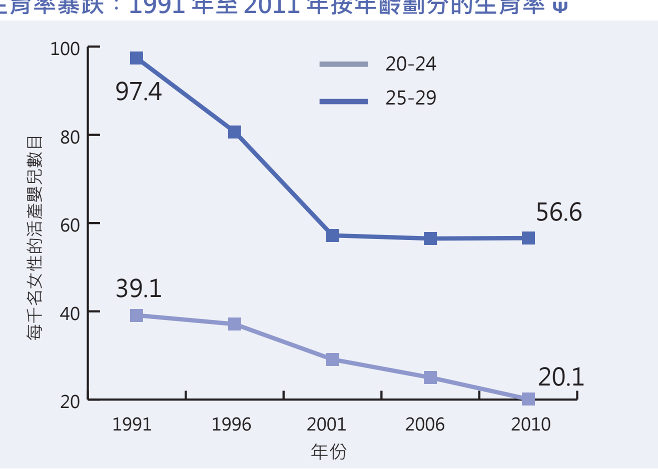
家庭傭工數據說明整個性別工資差距 ψ



科目選擇性別化：2011年按性別劃分的科目 ψ



生育率暴跌：1991 年至 2011 年按年齡劃分的生育率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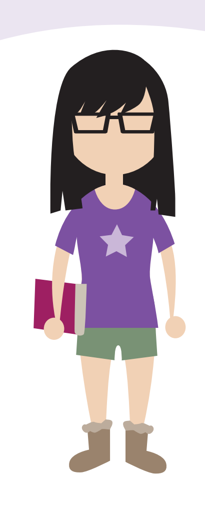
15-19

在學（90%，15歲至 19 歲）。ψ

中國人（95%，0 歲至 19 歲）。θ

未婚（99.6%，15 歲至 19 歲），沒有子女。ψ

生於 1992 年至 1996 年。



15 歲至 19 歲的典型女性

不大可能在2011年區議會（18歲至20歲的13%）或2008年立法會（18歲至20歲的21%）選舉中投票。ψ

住在4人家庭（40%，10歲至19歲）、與父母同住（94%，0 歲至24歲）、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54%，0 歲至19歲）、居於新界（55%，0 歲至19歲）。θ ψ

從未被捕或判刑，亦非被呈報吸毒人士。ψ

概況

15歲至19歲組別的數據比較粗略。由於數目小而造成的抽樣誤差導致人口普查若干類別未能提供相關數據，而青少年有時與兒童和/或年輕成人混為一談。有關青少女的價值觀和行為的學術文獻也相當稀少。

今天的典型青少女很可能住在 4 人家庭，最有可能與父母和一位兄弟姐妹同住，而 20 年前多數與 6 人或以上同住。有明顯少數（15%）居於單親家庭，部份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的離婚個案和單親家長，也有可能是因為其中一位家長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工作的「太空人家庭」。[13] 她可以預期在學直到至少 18 歲：自 2008 年度三三四教育改革以來，現今免費強迫教育達 12 年。由此可見 20 歲至 29 歲組別中逾半將接受專上教育，但由於教資會資助院校只為約 22% 的 17 歲至 20 歲人士提供學位，這意味大量青少年將尋求私立院校學位或出國留學。

有跡象顯示，對無法跟上學術要求的青少年的機會正在減少。參與經濟活動的青少年（無論是就業或待業中）的比例已大幅下降至 2011 年只有9%，但這些青少年的失業率高，尤其是男性。這個年齡組別的就業青少女最有可能從事銷售、膳食服務、文書和護理職位，而青少年實質工資在 1991 年和 2006 年間略為下降。雖然如此，大多數青少年未有製造麻煩。青少年成為人母較為罕見，2011 年每千名 15 歲至 19 歲女性誕下 2 名活產嬰兒。自 1990 年代中期逮捕人數一直下降，而被呈報吸毒人數在 1990 年代後期和 2000 年代初期飆升（女性比男性少得多），但自此已經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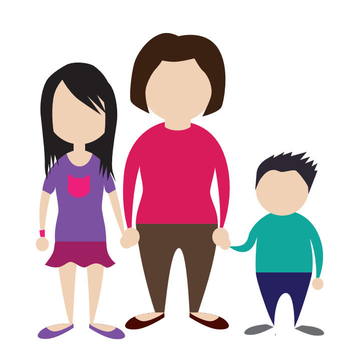
今天的青少女身處萎縮、全球化、異質性的社會。女性希望找到與男性公平競爭的工作環境，而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正在迅速改變。然而，不斷擴大的機會亦增添在生活各領域皆要取得成功的壓力，以及更多不確定性。良好教育程度不再保證高薪事業，而婚姻和生育在生命中不再是必然的。女性和男性皆需要學會共同駕馭此複雜和不斷變化的狀況。

註：未成年人士的人口普查數據往往按不同年齡組別編制，並已在本部份列明。有關數據來源請參閱資料匣1，第7頁。有關定義詞彙請參見第37頁。

另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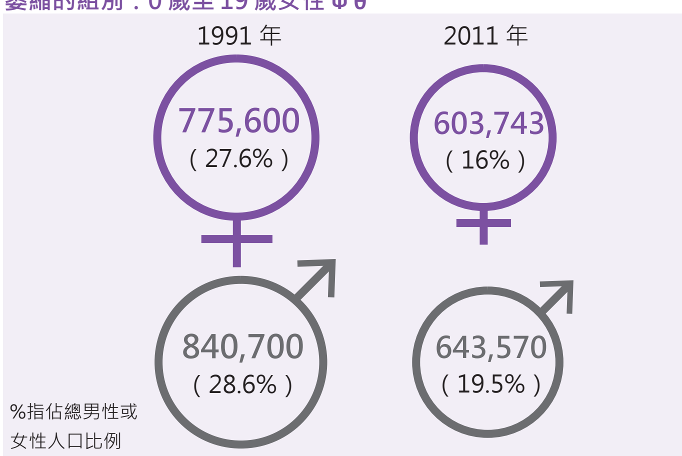
就業（8%，15歲至19歲）於零售或護理業，作為銷售/服務人員或文員賺取每月工資中位數$6,000。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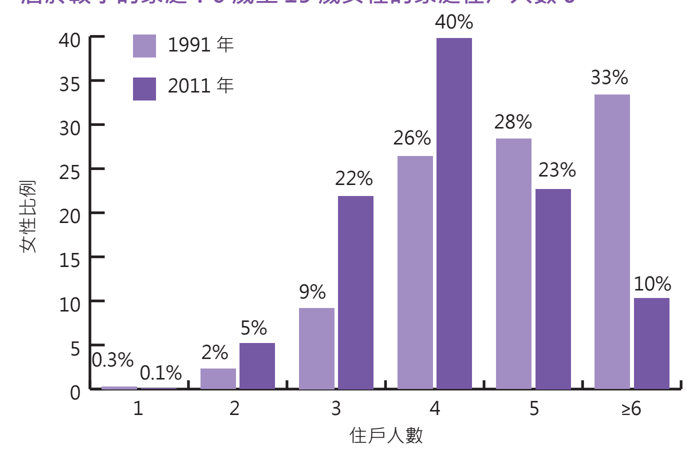
獨生或非獨生子女與僅一位家長同住（女性為 15%，男性為 14%，15 歲至 19 歲）。θ

主要數據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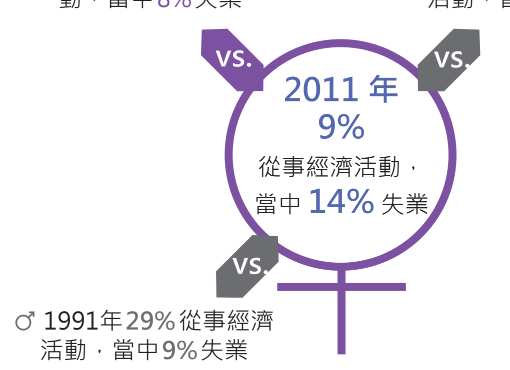
萎縮的組別：0 歲至 19 歲女性 ψ 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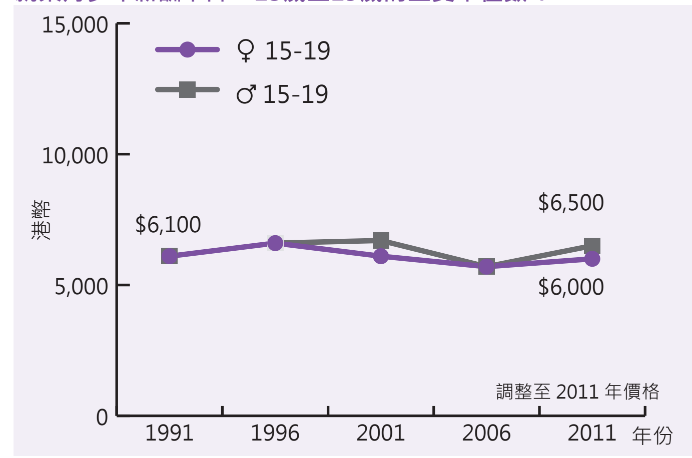
居於較小的家庭：0 歲至 19 歲女性的家庭住戶人數 θ 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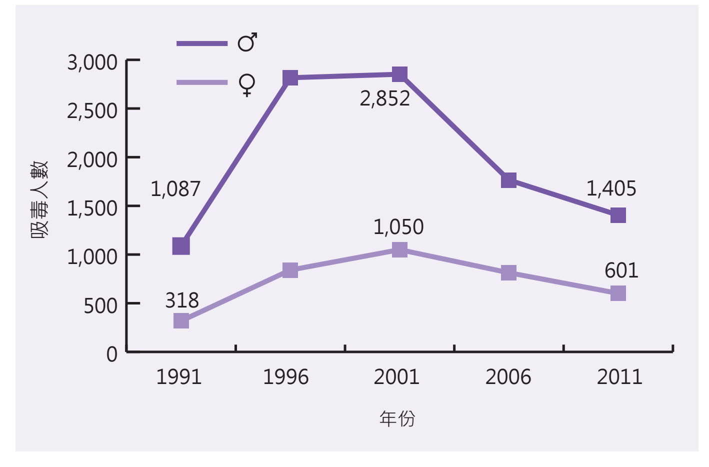
較少青少年就業，15 歲至 19 歲 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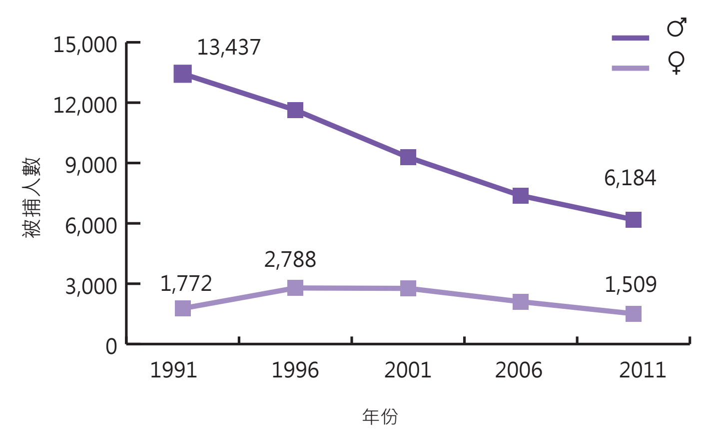
就業青少年薪酬下降：15歲至19歲的工資中位數 ψ



吸毒個案數目的升與跌：≤20歲被呈報吸毒人士 ψ



被捕人數下降：≤20歲青少年 ψ



2. 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

本部份根據戴高禮的報告《轉變中的香港：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從職業、移民、態度和公民參與了解女性不斷變化的狀況和態度。該報告建基於香港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14 年所收集的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該計劃自 1994 年起定期進行民意調查，建立了豐富數據，可用作探討各項人口普查數據未涵蓋的議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採用隨機抽樣方法，產生相當接近人口普查數據的代理人口統計（雖然主要剔除了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可以被視為相當可靠的社會趨勢指標。[15]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研究將其受訪者分為三個時間組別作比較：1994 年至 2000 年、2001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至 2010 年，為簡潔起見此摘要分別列為「90 年代後期」、「2000 年代初期」和「2000 年代後期」。所列數字是指定時間組別的平均數。由於幾個聯合調查的樣本數目龐大（2萬至 4萬受訪者），此做法可減少誤差範圍在 95% 置信區間至小於 1%。[16]

主要調查結果

- 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女性的人口狀況出現顯著變化，她們的教育程度和經濟競爭力已開始趕上香港出生的女性。內地女性來港不再簡單地當妻子和料理家務者；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內地女性來港入讀大學、充當經理或從事專業行業。

-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數據就按性別劃分的職業隔離提供了額外見解。雖然女性在獲取專上教育方面抬起頭來，其增長高於男性，但她們並沒有隨男性般在私營部門擔當專業和經理職位。相反，不成比例的女性人數正擔任教育工作者（2006 年至 2010年 4.8% 女性和 2.3% 男性）。女性也更有可能從事公營部門或私營化公共服務（如房屋委員會和機場管理局），在 2006 年至 2010 年有 21.3% 女性相比 16.7% 男性。這影響到女性在功能界別的政治代表性（見第30頁）。

- 愛國態度方面，男性總體比女性對中國國慶日較具強烈情感。男性較女性更感到「光榮/自豪」、「興奮」或「唔安樂/唔開心」，而女性則比男性更可能表示中性或「冇乜感覺」。分析表明，此性別差距存在於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而非內地出生的受訪者。總體而言，在香港出生的人就國慶日的正面感覺正錄得與在內地出生的人般同等速度增長。儘管最近「內地化」的爭議，香港人從長遠來看正在穩步調整在中國主權下的生活。

- 當被問到她們最關注的香港問題，不管是哪個時間組別，她們多表示關注社會問題，尤其擔心污染問題。然而，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間，兩性就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注顯著增加（但女性更為強烈），和首次不足一半受訪者指出經濟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 女性在香港的功能界別出現系統性的代表不足。功能界別選民偏向男性佔主導的經理、行政和專業職業。雖然功能界別女性選民數量不斷增加，她們都集中在少數行業，特別是教育、社會福利和衛生服務，因此她們的影響力沒有得到立法會廣泛注意。這可能導致香港決策架構無意識的偏見，而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整體女性對決策比男性更為不滿。

- 女性的公民和政治參與普遍貼近男性的水平，但在特定領域的參與亦出現性別比例失衡。男性較多參與和香港正式政治結構有關的領域，如公共屋邨的互助委員會、私人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以及專業組織。男性尤其在專業人員協會抬頭，這可能加劇了女性在功能界別的代表性不足。女性較多參與以議題為主的團體，如慈善機構和社會服務機構、環保團體和宗教團體。儘管這些團體並不一定總是從事政治游說的工作，但它們可以迅速推動人們參與富爭議性的議題。



內地移民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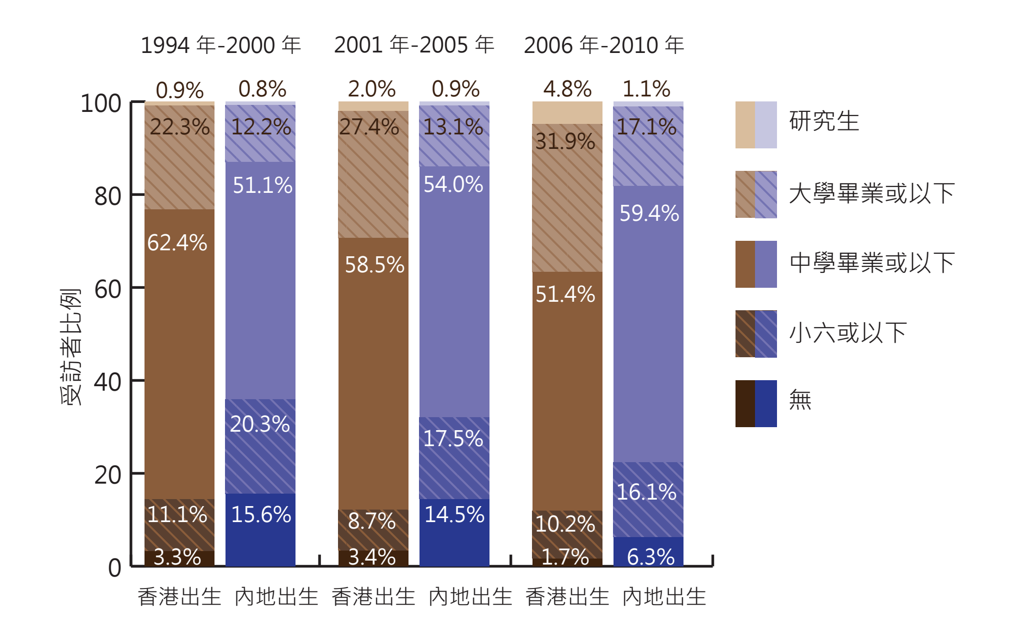
調查數據顯示，對內地移民女性的固有看法，即非技術性料理家務者與年長多年的香港男性結婚，經已過時。2003 年至 2008 年間移民政策的轉變令移民人口出現改變。在 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在 2006 年推出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並於 2008 年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17]因此，內地女性不再只以單程證來港當妻子，更多白領、本科生和研究生正取得入境許可，而當中許多學生畢業後留港。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教育數據顯示，儘管她們的起始基數較低，在內地出生的女性現在以香港出生女性的同等相對速度獲得專上教育。在第二和第三的時間組別之間，所有年齡的內地出生和香港出生女性達專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均增長了約 28%。同時，在 18 歲至 29 歲間的內地與香港出生女性達專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均增長了約 26%。年輕內地出生女性已經趕上 1990 年代後期的香港出生女性。

職業數據也顯示，內地出生女性作料理家務者的比例仍高於香港出生女性，但差距正在縮小。就經理和專業人員方面，內地出生女性在收窄與內地出生男性的差距，表現略好於香港出生女性與香港出生男性的差距。香港出生的經理和專業人員的性別平衡自 1990 年代後期並沒有顯著改變。然而，內地出生的女性經理和專業人員比例略有增加，尤其在 2000 年代初期和後期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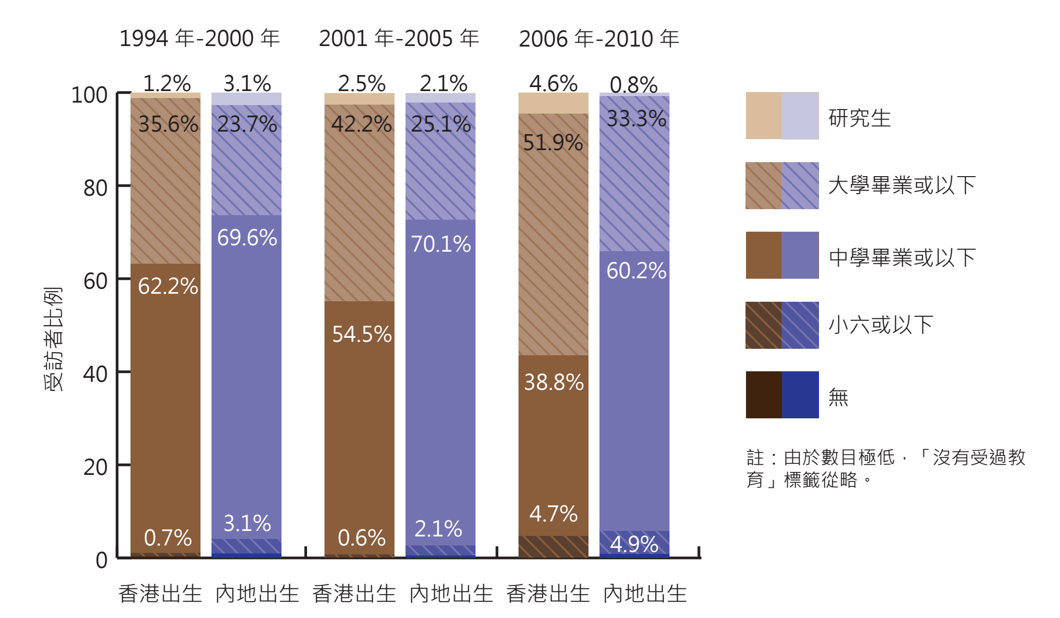
由於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選樣不包括尚未在香港住滿七年的移民，社會上的真實情況甚至可能比數據顯示轉變更大。

香港和內地出生女性的教育程度（所有年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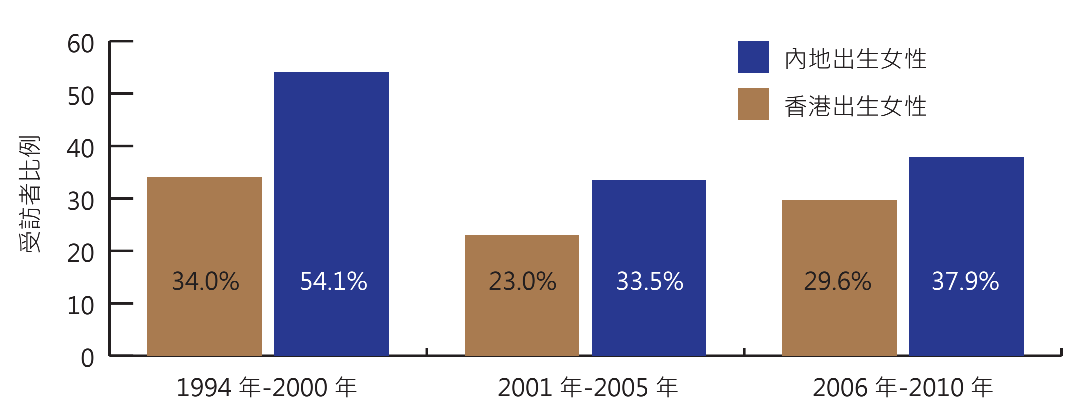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香港和內地出生女性的教育程度（18 歲至 29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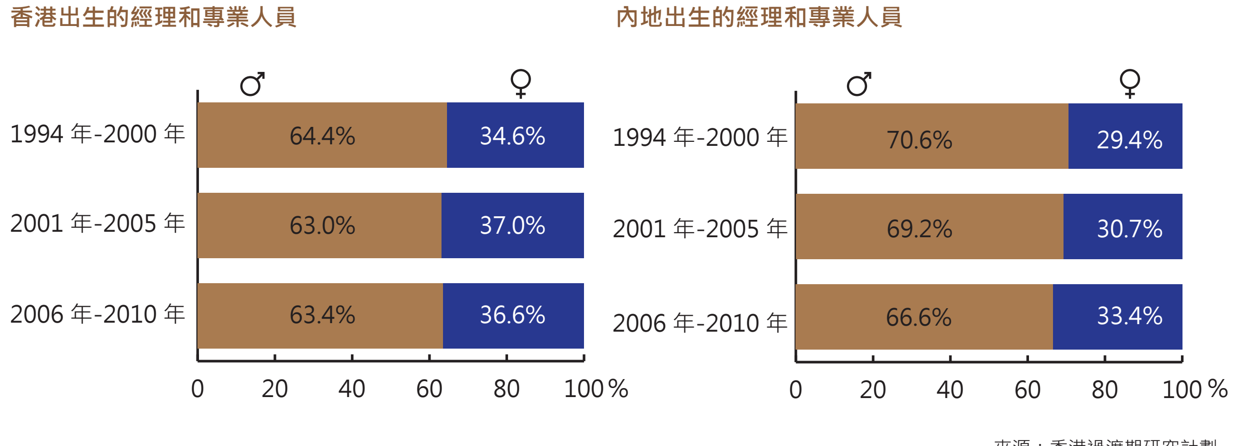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香港和內地出生女性中料理家務者的比例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香港和內地出生的經理和專業人員的性別平衡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職業隔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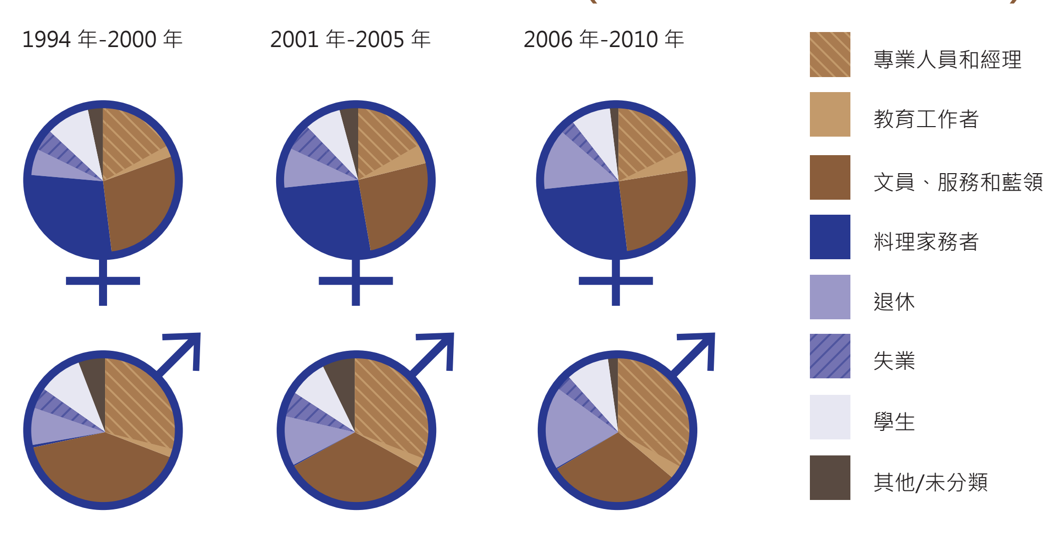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職業分類有別於政府統計處的分類，這使我們能夠進行一些人口普查數據未能清楚顯示的性別狀況。政府統計處以三個不同分類方案根據職業、行業和經濟活動狀態組織就業數據，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分類則橫跨此三個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工作者自其他專業人員類別分隔出來，包括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學生、料理家務者、退休人士及失業人士，也把受訪者按在公共或私營部門工作而作出分類。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數據表明，事業轉型（即轉型至專業和經理職位）在男性出現（從 1990 年代後期的 29.1% 上升至 2000 年代後期的 33.1%），但女性卻未有出現這情況。反之更多女性投身教育行業。女性較多於公共部門或私有化的公共部門（包括機構如房屋委員會及港鐵公司）工作，反映了在教育、護士和社工等職業的女性優勢。

人口普查的職業數據並未有如此清楚顯示這一點，因為其將教育工作者、護士和社工歸入其他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類別。然而，人口普查的行業數據則支持這一點，顯示護理業（涵蓋公共管理、教育、人類衛生和社工活動、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以及其他服務）在很大程度上以女性為主，並自 1991 年以來，情況更甚。

按性別和職業劃分的組別比例（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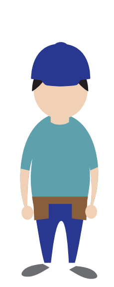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1994 年-2000 年		2001 年-2005 年		2006 年-2010 年	
	♀ %	♂ %	♀ %	♂ %	♀ %	♂ %
專業人員和經理	17.10	29.10	16.90	31.10	17.90	33.10
教育工作者	2.60	2.10	4.40	2.20	4.80	0.30
文員、服務和藍領	28.50	40.80	26.00	33.90	25.50	30.30
料理家務者	28.30	0.41	26.10	0.26	25.10	0.20
退休	5.90	8.20	8.80	11.50	13.20	18.20
失業	4.70	4.50	5.60	5.60	3.00	3.40
學生	9.70	9.30	8.30	8.60	8.60	9.30
其他/未分類	3.20	5.70	3.90	7.00	1.80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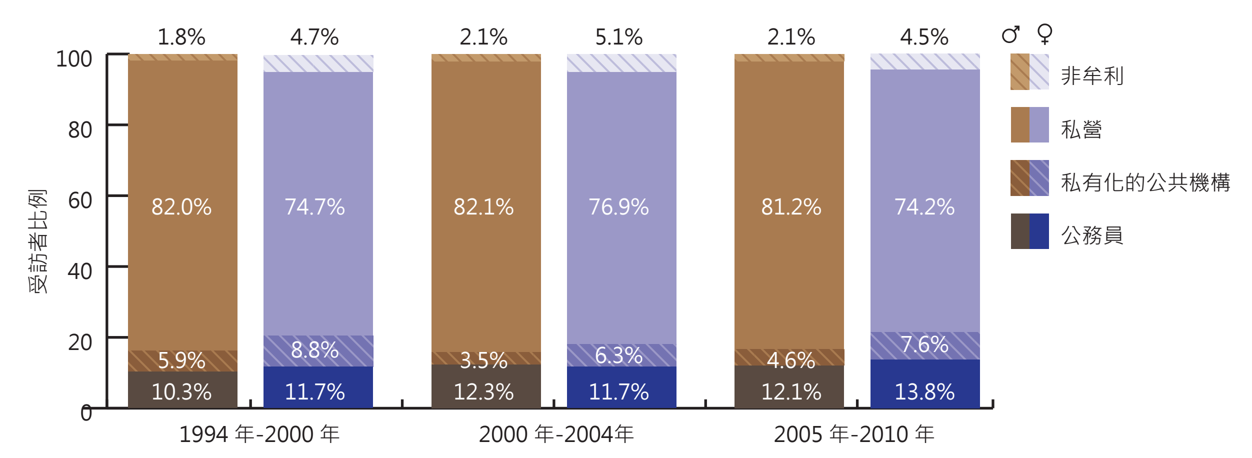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數據的分析顯示，在 1990 年代後期，男性和女性失業的可能性均等，而到 2000 年代後期，男性明顯比女性更有可能失業。

總體而言，男性更成功地投身白領職位，而女性則更集中於「粉領」職位。但是，部份男性比女性表現更差，男性較高的失業率可能導致教育水平較低和較年輕的男性，由於無法找到白領工作另又被女性自服務為主的工作拋離，增加他們政治上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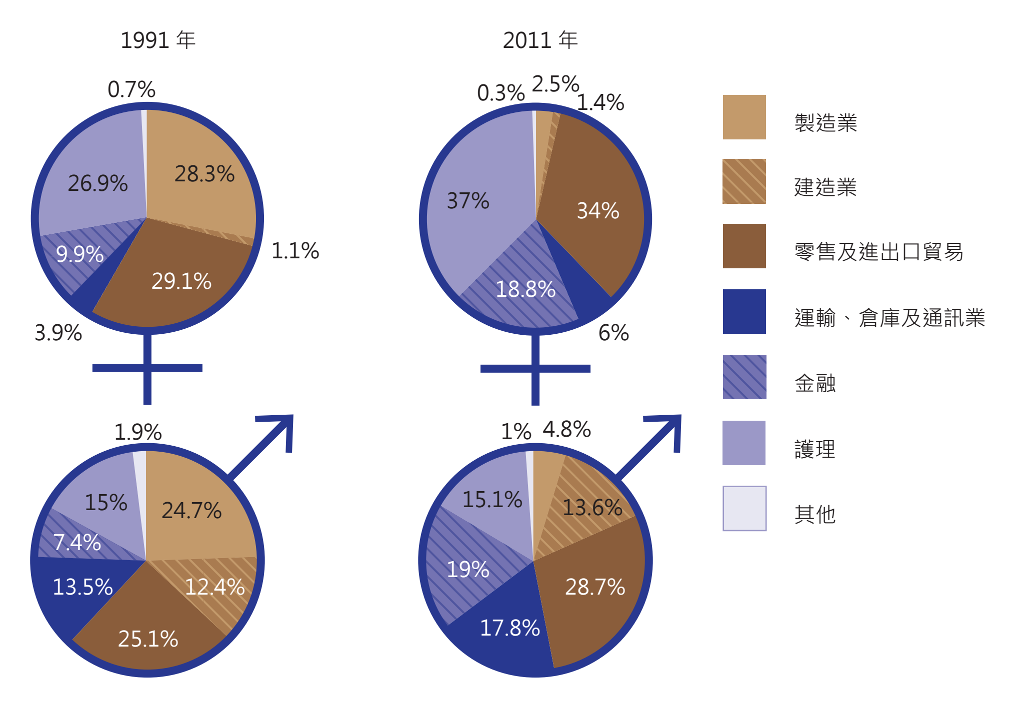
最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數據也顯示，特別是男性藍領如何隨著人口高齡化邁向退休階段。雖然從人口統計角度看，女性長者多於男性，但更多男性形容自己為退休人士。這可能是由於主要身份是料理家務者的女性（料理家務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在到了退休年紀仍繼續如此描述自己。這突顯政策制定者在處理退休時需要注意性別議題，而且「一刀切」的政策可能並不適用。

按界別劃分的就業男性和女性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按行業劃分的就業男性和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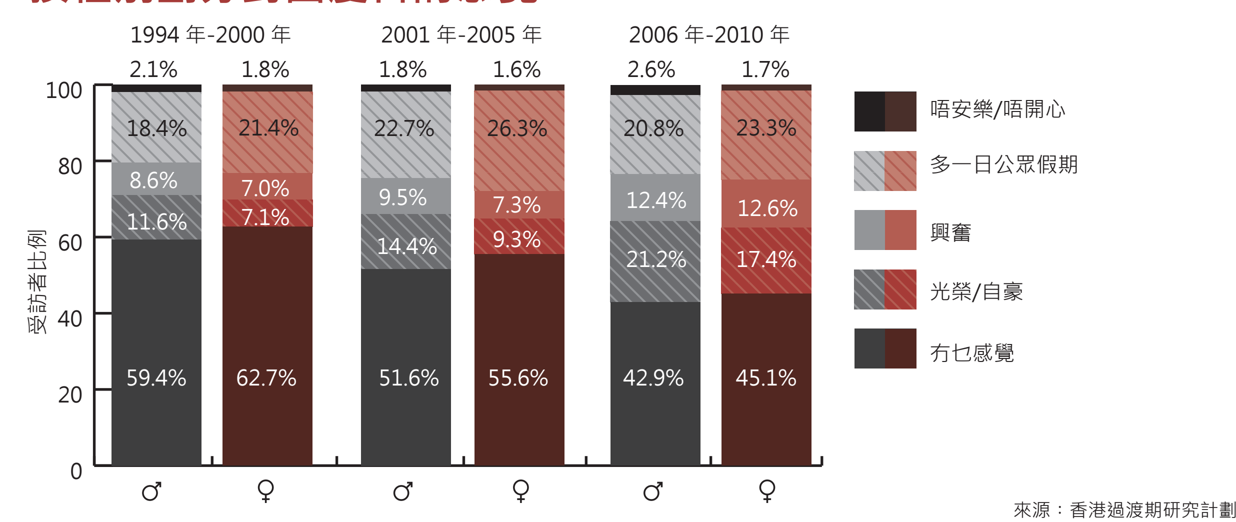
來源：政府統計處

對中國國慶日的感覺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調查詢問受訪者對中國國慶日的感覺：「冇乜感覺」、「光榮/自豪」、「興奮」、「多一日公眾假期」或「唔安樂/唔開心」。他們的反應被視為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的指標。總體而言，男性一直顯示對國慶日有更正面或負面情緒，而女性則保持較中性或「冇乜感覺」的態度。但是，「光榮/自豪」和「興奮」的感覺已在 1994 年至 2010 年間持續上升，而女性比男性增幅更大；而熱情的差距已經縮小：在 1990 年代後期，表示就國慶日感到「光榮/自豪」或「興奮」的男性比女性多出 6.1%，但到 2000 年代後期此差距為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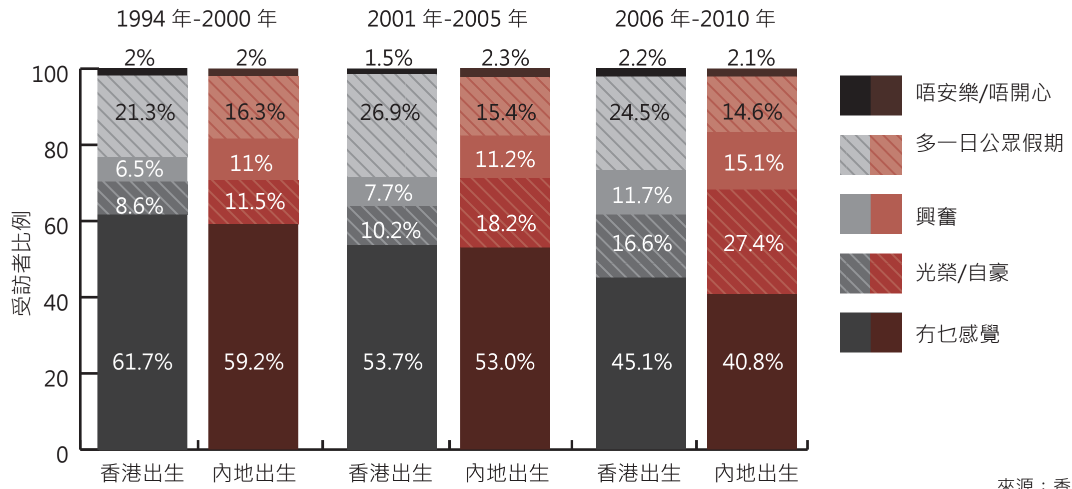
如以出生地作進一步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在香港出生的男性比香港出生的女性較少感覺中性或「冇乜感覺」，但在內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之間並無顯著差異。總體而言，內地出生的受訪者較香港出生的受訪者就國慶日表現出較多的正面情感，但兩者對國慶日經已以幾乎同樣速度變得更為正面。香港與內地分隔了一段長時間後，香港人的態度正穩步和肯定地改變。

按性別劃分對國慶日的感覺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按出生地劃分對國慶日的感覺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個人關注領域

兩性所關注議題的優次有什麼不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調查詢問的受訪者：「你個人最關心的香港問題是什麼？」此問題屬開放式，回應亦經重新編碼和分類為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見下表）。第一和第二時間組別的男女均表示主要關注經濟議題，但在第三時間組別的受訪者表示關注經濟議題的則首次降至低於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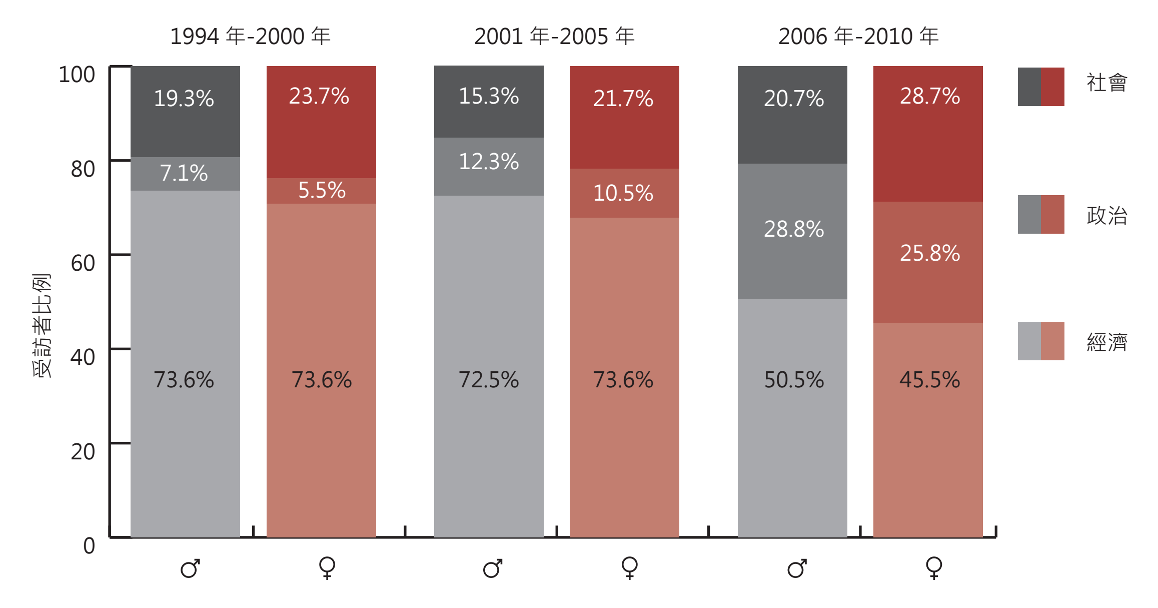
女性一再表示更關注社會議題，其他調查結果顯示她們更關心污染問題。[18] 這可能是因為女性往往負責家庭健康方面的決定。

另外，調查結果發現，女性幾乎和男性一樣關心政治議題。但由於女性多主理家庭開支以及在 2012 年以前選民登記的代表性不足，這項發現也許教人感到意外。

就個人最關注議題（按經濟、社會和政治劃分）的重新編碼回應

經濟議題	社會議題	政治議題
減薪	優質教育	貪污
就業/失業	罪案	政治穩定
經濟增長	公共醫療服務	新聞、示威、出入境自由
商業機構結業	污染（空氣和/或水）	香港自主權
價錢合理的居所/樓市	人口過多	公正司法制度
香港股市		公務員處事能力
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行政長官處事能力
貧富懸殊		
減少社會福利		
長者福利		

按性別劃分的個人最關注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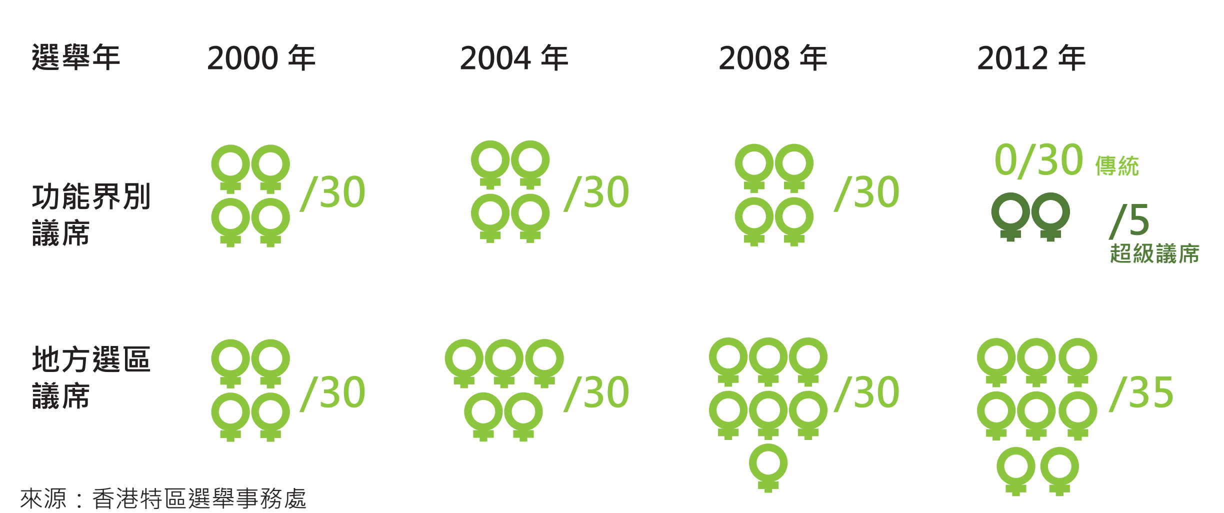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功能界別

功能界別是香港以專業和行業為基礎的議席，佔立法會一半議席數目。在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有共35個功能界別議席：30 個由小部份精英選出的「傳統」功能界別議席，和5個新增區議會「超級議席」。「超級議席」候選人由區議員提名，但由所有地方選區登記選民投票選出代表。

自 2000 年以來，女性在直選產生的地方選區議席比例穩步增長，但功能界別議席則保持穩定直到 2012 年的選舉，在 2012 年當選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的女性人數下降至零。

2000年至2012年當選立法會功能界別和地方選區議席的女性人數



來源：香港特區選舉事務處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數據證實，功能界別選民及候選人絕大多數是具高學歷的經理和專業人員，這些精英偏向男性（見對頁）。因此，男性在功能界別的比例過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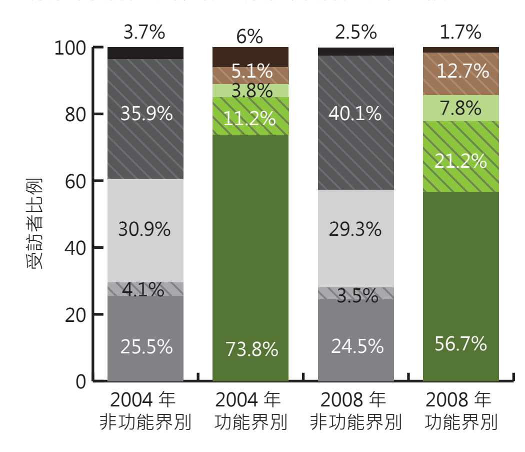
然而，這也有例外，即主要指教育功能界別。教育界是其中一個少數女性佔主導的功能界別議席。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十名女性中約有一人是教育工作者，相比男性分別為 3.2% 和 6.5%。分析顯示，在 2004 年至 2008 年間，在登記作為功能界別選民的教育工作者中，女性人數增長超過男性。然而，這並沒有轉化為更多功能界別女性議員，因為教育界只有一位代表。雖然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調查並沒有蒐集其他女性為主的護理行業的具體數據，但類似情況很可能存在於衛生服務和社會福利行業。

此外，女性專業人員似乎沒有跟上男性擔任各自領域內領導角色的比例。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數據顯示，自 1990 年代後期專業人員協會的參與已越來越為男性主導，但這種情況的原因不明。（專業人員協會的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為個人，而非團體選民。）即使是女性佔主導的功能界別議席亦通常由男性作代表。例如，長時期擔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前主席張文光，由 1998 年至2012 年代表教育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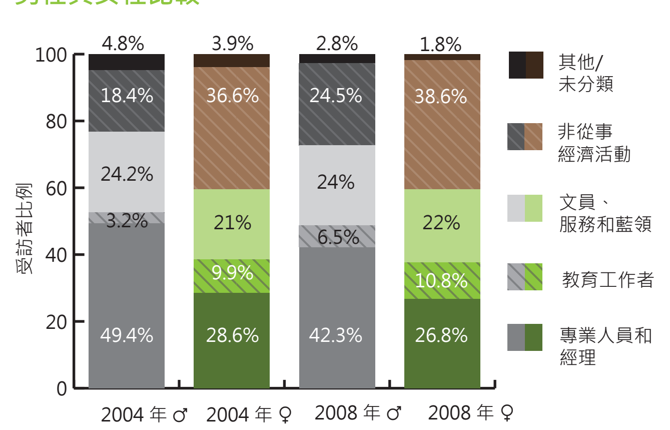
這些因素可能有助解釋，為何多年來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許多調查結果皆顯示女性更為不滿， 以及女性比男性更認為政策制定不公平。

2004 年和 2008 年受訪者的職業

功能界別選民與非功能界別選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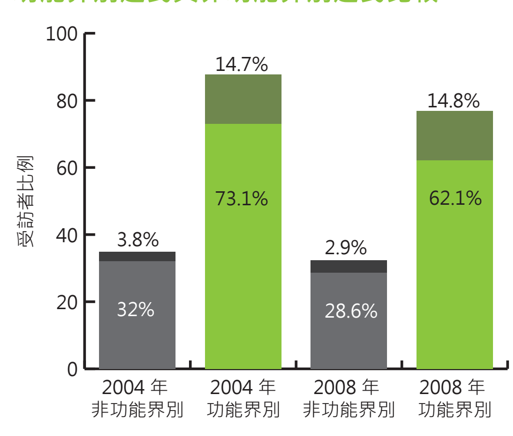
男性與女性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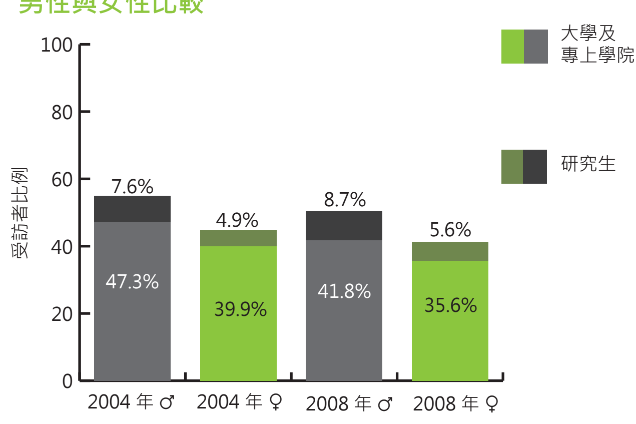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2004 年和 2008 年具專上教育程度受訪者比例

功能界別選民與非功能界別選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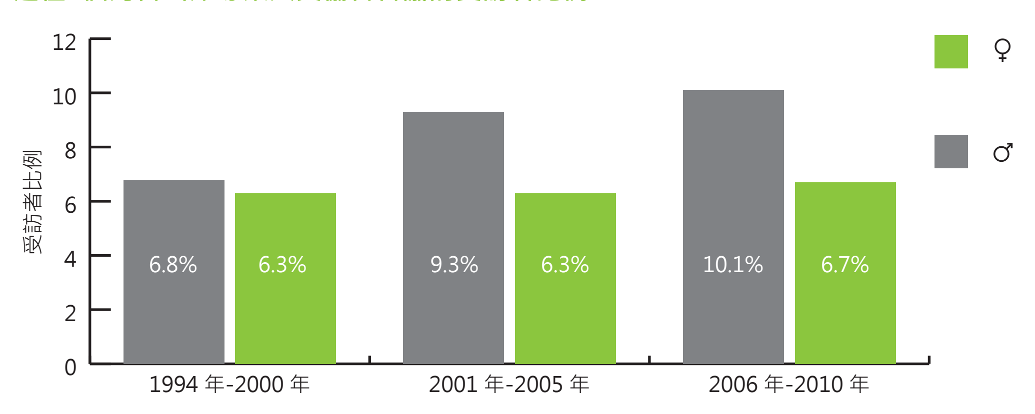
男性與女性比較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1994 年至 2000 年、2001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至 2010 年按性別劃分的專業人員協會參與率

過往6個月曾出席專業人員協會會議的受訪者比例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公民參與

女性參與民間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與男性有別嗎？要了解民間社會的參與，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詢問受訪者，在之前六個月有否出席各類民間社會團體的會議或活動（見對頁）。這些組織分為四類：工會、專業人員協會、居民團體及議題團體。

為了解政治表達情況，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詢問受訪者，在之前12個月有否以不同方式就議題表示關注或尋求幫助。這些行動包括聯絡政府機構如政府部門或立法會議員、聯絡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社會機構如媒體，或參與個人以政策為導向的行動如簽署請願書。

回應的整體狀況表明，在大多數公民和政治參與的形式中男性略優勝於女性，但差異不是很大。然而，男性似乎更多參與跟香港正式權力架構有關連的組織，而女性則更多參與正規架構以外的組織，還可以不時就具體政策問題施加影響。

正如在第 26 頁至第 27 頁提到，在三個時間組別中，男性的專業人員協會參與率比女性有更明顯的上升，這可能有助解釋男性在功能界別比例過高的原因。此外，參與居民組織如互助委員會和特別是業主立案法團的性別差距，在第一和第三時間組別間已經擴大。每座公共屋邨樓宇都有互助委員會，其作用是向有關政府機構報告問題如垃圾收集、運輸和噪音投訴。互助委員會在過去為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成員提供了參選區議會選舉的階梯。業主立案法團在私人屋苑亦有類似作用。

相反，女性參與社會服務和慈善組織、宗教團體的比例一直和環保團體方面一直超過男性。在社會服務和慈善組織方面，男性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女性的差距，但在宗教和環保團體，女性參與率的上升已經超過男性。

總體而言，儘管參與政黨和壓力團體的比率很低，但數據顯示兩性的公民參與急劇上升，這有助解釋為何香港人能夠就政治問題迅速動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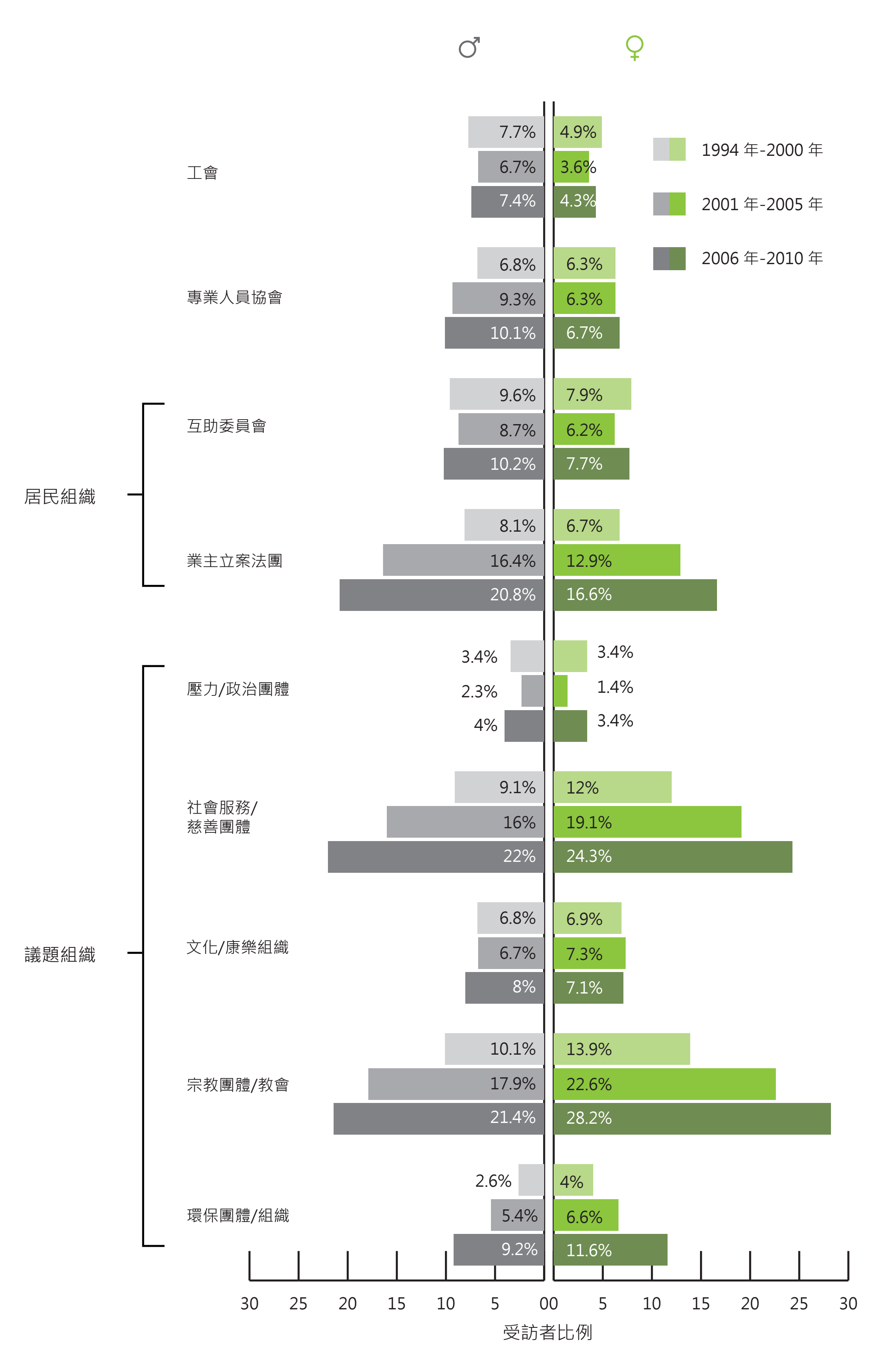
就政治表達方面，女性聯絡政府機構頻率往往較男性略低，但兩性在這方面的表現出幾乎相同的增長。這可能表示，在回歸後他們對本地政府的疏離感下降，尤其是在內地出生的受訪者。內地出生的受訪者在 1990 年代後期至 2000 年代初期之間，聯絡政府機構的比例增長了 2.8%，對比在香港出生的受訪者為 1.2%。[19]

兩性在聯絡以政策為導向的公民社會機構都錄得相當大的下降程度。這可能反映對媒體影響的信心下降、因市區重建造成地區街坊搬遷，和香港以尋求幫助為實的政黨短暫歷史。相反，個人行動出現增長，如參加集會、簽署請願書。在此，女性的行動與男性的緊密相匹，甚至在 1994 年至 2000 年時間組別超逾了男性。

就女性的公民和政治參與水平而言，她們沒有擔任更多領導角色是令人費解的。香港已有三個政黨/政治組織由女性成立：在 1990 年代後期由陸恭蕙成立的民權黨（現已解散）；由劉慧卿領導的前綫(與民主黨合併)；和由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2011年成立的新民黨。前兩者在立法會一直各只有一位代表，而其所成立的政黨/政治組織並未能成功進一步發展。這是否意味女性領袖在網絡聯繫和指導方面位處弱勢，則須作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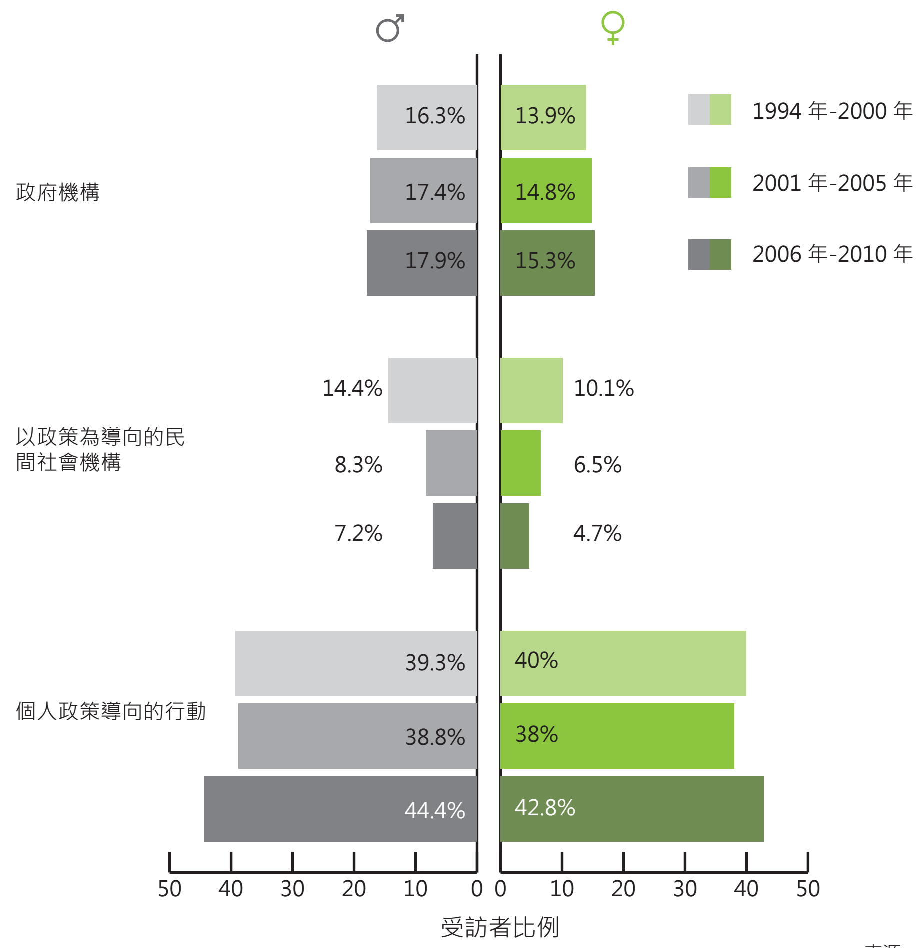
在本報告所涵蓋的時間，女性在教育、收入和參與方面已明顯地有所進步，但在其他領域仍然面對許多挑戰，因為女性不僅要與男性平等參與事務，她們也必須同樣平等地參與領導，制定政策和施政。

按性別劃分的民間組織參與率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按性別劃分的政治表達渠道



來源：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聯絡政府機構	聯絡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社會機構	個人政策導向的行動
政府部門 直選產生的立法會代表 功能界別代表 區議會/民政事務專員	媒體 地區團體或街坊組織 壓力團體/政黨	參與集會/遊行/抗議活動 簽署請願書

建議

要求更方便取得數據

是次研究突顯了香港人口統計數據的一些問題，包括有否有關數字或如何使用有關數字。政府收集了許多寶貴數據，但卻沒有充份運用它們。不記名的人口普查樣本並沒有免費提供給研究人員，這使他們無法進行一些技術性的詳細統計分析，如多元回歸分析。這也是我們以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數據作為代理來源的部份原因。我們不時發現很難找到或得到公開可用的人口普查數據，或只能取得有限的類別或時段。例如，政府統計處網站只有很少 1997 年以前的數據。同時，普查數據與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並不總是一致。計算方法的變動需要作更詳細解釋，過往的數據亦應保持可用狀態，以便更仔細地研究趨勢發展。另外，最近發現政府部份統計數字並不準確，我們希望政府會嚴正處理這個問題，以確保未來統計數字的可靠性及可信性。

如能更全面和更精密地理解人口趨勢，將有利於香港的公共討論，並有助政策制定者訂出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另外，若能了解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和少數群體也將有助政策制定者針對特定群體制定政策。我們建議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方式使數據更為可用和更方便用家。

政策制定者應優先關注的事項

以下是政策制定者應優先關注的事項：

- 極有需要改善長者的生活，尤其是女性長者。2011 年至 2012 年度的經常性盈餘為 380 億港元，政府有能力改善這個群體的福祉。這需要短期內改善今天長者的生活，以及更長遠地為未來的長者作打算。

- 要扭轉香港的低生育率，需要更深入了解育齡女性所面對的限制和鼓勵措施。政策應旨在消除特定性別的機會成本，例如促使香港在工作、教育、房屋和環境方面成為對家庭更友善的城市，以及改善整體年輕成人的前景。

- 數據顯示一般年輕成年人即使教育程度較高，他們所得的工資往往未能反映這一點。政策制定者訂出的經濟和教育政策，應旨在擴大就業機會，確保年輕人獲得當今經濟環境所需要的技能，以及更廣泛地分佈經濟增長成果。

- 今天的青少年在邁向成年時面對越來越多壓力。青少女今天成長於政府提供 12 年免費教育的年代，她們的教育水平理應可與同齡的男生看齊，而他人對她們在事業、家庭角色和生活方式也有很高的期望。然而，跟男性相比，女性擔任領導職位的數目仍有大而明顯的差距，而過去 20 年「粉領」工作更變得女性主導。政府、企業和非牟利機構應共同努力，確保女孩和年輕女性在生命的關鍵過渡階段看到模範和得到支持。

- 內地移民女性的概況正在迅速變化：內地女性來港不再只是當料理家務者，而是來港就學或擔任經理和專業職位。此外，在內地出生的居民的撫養率最近已經開始下降，因為在內地出生的兒童已長大成人，加入勞動市場。政策制定者必須小心處理反內地的公眾壓力，因為內地移民在支援香港未來老齡化和退休居民負擔的壓力上將發揮重要作用。

- 數據顯示，香港女性積極參與民間社會事務，但由於種種原因，她們在香港正式權力架構的參與並沒有跟上男性。由於女性更關注社會問題，政策制定者可能會不自覺地低估佔香港人口一半的女性所關心的事項。

因此，不管是衞生護理、教育抑或環境方面，在制定社會政策和作人力資本的投資上，都應該作出更深層的考慮。

研究人員優先關注的事項

本報告也建議研究人員可先於下列範疇進行研究：

- 應該馬上開展研究中年女性對其晚年的期望和需要，那樣香港就不會再次讓長者失望。由於她們教育程度較佳、更有可能賺取個人收入，並在工作間有自己的身份，她們的要求將與今天的女性長者不同。

- 除了人口特徵，不斷變化的價值觀亦有許多研究空間。受全球化的影響，一些與傳統中國價值觀有所不同的現代價值觀深入民心，香港今天也就身處在這麼一個複雜且相互矛盾的世界。價值觀改變行為，最終影響家庭結構、房屋、福利、稅制和無數其他政策領域。

詞彙和定義

1. **教育：**教育程度指的是「最高就讀程度」。由於數據收集方法和教育政策轉變，教育程度的定義，特別是「專上非學位課程」，每年略有不同：

    - 2011 年：按《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12 年版的分類。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士是指那些達到中一至中三教育程度。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士是指他們達到中四至中七教育程度或同等程度。具有專上教育程度的非學位課程人士是指那些達到證書、文憑、高級證書、高級文憑、專業文憑、副學士、副學士先修、增修證書、院士銜和其他副學位課程或同等程度的人。

    - 1991 年：高中包括高中、預科、工業學院的技工課程；專上非學位課程包括工業學院/理工學院的證書/文憑課程、工業學院/理工學院的高級文憑/增修證書課程、理工學院的院士銜或同等課程、師資培訓課程、護士訓練課程、其他專上院校的非學位課程；專上學位包括學士學位和研究生課程。

2. **生育率：**以年齡劃分的生育率是某一年齡段在特定年份的每千名活產嬰兒數目。要注意的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2011 年的所有以年齡劃分的生育率是臨時的。總生育率描述如一名女性在其生命中體驗目前以年齡劃分的生育率，而她自出生存活至育齡期結束，她一生的生育平均數目。

3. **行業：**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1991 年至 2007 年的行業類別按照「香港標準行業分類1.1版」。2008 年至 2011 年則按照該分類 2.0 版。雖然 1991 年和 2011 年的類別不同，不同行業的轉移仍然是明顯的。在此摘要裡，類別標籤的簡稱如下：

    -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簡稱為「零售」。

    -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簡稱為「進出口貿易」。

    -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簡稱為「金融」。

    -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簡稱為「護理」。

    -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簡稱為「運輸及通訊」。

4. **房屋：**在 1991 年，公營租住房屋包括房屋委員會甲類和乙類租住單位，以及房屋協會租住單位；資助自置居所房屋包括房屋委員會居者有其屋屋苑；私人永久性房屋包括私人獨立和非獨立單位、別墅/平房/新型村屋和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非住宅用房屋包括院舍及其他永久性房屋（如旅館、員工宿舍等）；其他臨時房屋包括天台屋和其他臨時房屋。2011 年類別按照 2011 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表，其他臨時房屋包括住在船艇上的家庭住戶。

5. **通脹**：凡註明的昔日幣值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調整至 2011 年價格。

6. **勞動人口參與：**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從事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士（即工作人口）及失業人口，是勞動人口的代名詞。就業人士是年滿 15 歲人士、在統計前七天內有從事工作以賺取薪酬，或有一份正式工作和可劃分為自營作業者、僱主、僱員或無酬家庭從業員（意味為有關家庭生意工作但無收取報酬的人）。失業人士是年滿 15 歲、在統計前七天內並無職位，且並無工作，並在這七天內隨時可工作及在統計前 30 天內有找尋工作；有找尋工作但因由於生病而不能工作；已為擔當的新工作作出安排；或正期待返回原來的工作崗位的人士。經濟活動身份和非經濟活動身份的數據按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涵蓋香港陸上非住院人口編制，因此不包括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不同於編制自 2011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數據，該普查包括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

7. **國籍：**「國籍」的有關數據載列於註1所指的香港居民人口。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國籍」可能是個人的居住地、種族或出生地，可能與該人的旅行證件無關。這是由於在 1997 年後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凡在中國內地或香港出生，並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及前居民，都視為中國籍。在 1997 年之前，國籍分類根據該人的旅行證件，因此 1996 年中期人口統計及再之前的數據收集方式並不同。如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可指在中國內地或香港出生）被歸類為「定居」香港，此人應是香港居民並選擇了香港為居籍。如具有中國國籍的人被列為「非定居」，是其雖然為香港居民但認為其居籍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8. **職業：**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職業是指某人在統計前七天內他/她所從事的工作種類、性質及主要職務。由 1993 年到 2010 年，分類基本上是按照「國際標準職業分類：一九八八」或 ISCO-88 的主要組別，並因應本港情況作出修訂。此分類方法與 1993年之前採用多年的方法有顯著差異，因此，1993 年的數字代替了 1991 年的數字。在2011年，政府統計處以「國際標準職業分類：二零零八」或 ISCO-08 更新其分類方法。這意味 2011 年的數字不能直接與較早前的數字作比較，但儘管如此，我們在此摘要和 Louisa Mitchell 的報告內並排臚列這些數據。下面列出了官方的類別及其定義，但是，在此摘要報告中，為求簡潔和易於理解的緣故，以下兩個類別標籤已被修改或合併：

   - 「工藝及有關人員」和「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已合併為一類稱為「技術工人」。
   - 「非技術工人」保留原稱。

   ISCO-88/ISCO-08 類別：

   - 經理及行政人員：包括政府的行政人員、專員及署/處長；領事；議員；工商界、進出口貿易、批發和零售業、飲食及旅店業、運輸、電力、燃氣、水務業及其他服務、以及漁農業中的董事、執行總監、總裁、總經理、專職經理、分行經理及小型機構經理。
   - 專業人員：包括合資格的專業科學家、醫生、牙醫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建築師；測量師及工程師；大學及專上學院的校長、院長、教職員及行政人員；中學校長及教師；統計師；數學家；電腦系統分析員及程序編寫員；律師及法官；會計師；商界顧問及分析員；社會工作者；翻譯員及傳譯員；新聞編輯及新聞記者；作家；圖書館管理員及宗教活動專業人員。
   - 輔助專業人員：包括科學技術員、護士及助產士、牙科助理及其他保健輔助專業人員；建築、測量及工程技術員；光學及電子儀器控制員；船隻領航員及空中交通指揮員；小學及幼稚園/幼兒院校長及教師；統計助理；電腦操作員；法律文員；會計督導員；公共關係主任；營業代表；設計家；屋邨經理；社會工作助理；警隊及其他紀律部隊的警司、督察及主任；藝人及運動員。
   - 文員：包括速記員、秘書及打字員；簿記、金融、船務、存案及人事部文員；出納員及銀行櫃位員；接待員及查詢文員。
   - 服務及銷售人員：包括機艙服務員及導遊；管家；廚師及侍應生；褓姆；理髮師及美容師；警隊及其他紀律部隊的員佐級人員；運輸指導員及其他服務工作人員；批發及零售商店推銷員；店員及時裝模特兒。
   - 工藝及有關人員：包括礦工及採石工人；砌磚工人、木匠及其他建造業工人；金屬模工；鐵匠；機械、電器及電子儀器技工；珠寶工人及手錶製造工人；製陶工人；排字工人；麵包師傅、食品及飲品處理工人；油漆工人；紡織、成衣、皮革、橡膠和塑膠行業的工人及其他工藝工人。

-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包括鑽井工人及鏜床操作員；礦熔爐操作員；磚及瓷磚燒窰工人；鋸木廠鋸工；造紙工人；化學處理機台操作員；發電廠及鍋爐操作員；石棉水泥產品製造工人；金屬整理工人及電鍍工人；牛奶製品及其他食品處理機器操作員；印刷機操作員；生產紡織、橡膠及塑膠製品的機器操作員；裝配員；司機；海員及其他工廠及機器操作員。

- 非技術工人：包括小販；家務助理及清潔工人；信差；私人護衛員；看更；貨運工人；電梯操作員；建造業雜工；包裝工人；漁農業雜工。

- 其他：包括農夫、畜牧業工人及漁夫、及報稱的職業不能分類或描述不足。

9. **預期餘下壽命：**出生時預期壽命代表整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而餘下的預期壽命是特定人口已達到了指定年齡如 60 歲。在 2011 年，60 歲女性預期再多活 27.3 年，即直至 87.3 歲。這個數字略高於出生時預期壽命的 86.7 歲，因為不包括已離世者。

註

1. 人口普查和中期人口統計數據（1991 年、1996 年、2001 年、2006 年、2011 年）涵蓋居港人口，包括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常住居民是在普查參考時刻前或後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三個月的永久性居民或於普查參考時刻在港的非永久性居民）。其他年份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涵蓋香港的陸上非住院人口，因此不包括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意味其涵蓋 99% 香港居民人口。這也許可以解釋不同年份的數據差異。

2. 周永新和林一星（2008 年），《香港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提交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最後報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只有英文版），http://www.cpu.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s/20080822%20Trends%20in%20family%20attitudes%20and%20values%20in%20Hong%20Kong.pdf（瀏覽日期：2012年4月23日）。

3. 婦女事務委員會和政策二十一（2011 年），《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research_statistics/research_status_of_women.htm（瀏覽日期：2012年5月3日）。

4. 數據來自 4 個主要來源：

   -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1 年），《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表》，香港：香港政府；
   -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1 年），201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表，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us2011.gov.hk/tc/main-table.html（瀏覽日期：2012年8月31日）；
   -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2 年），《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2年版》，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80_tc.jsp?productCode=B1130303（瀏覽日期：2012年8月31 日）；及
   - 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2 年），《香港人口生命表2006-2041》，香港：香港特區政府，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90_tc.jsp?productCode=B1120016（瀏覽日期：2012年8月31日）。

5. 由於來自中國內地的大規模移民，香港人口由1945 年估計不到 100 萬增加至 1981 年達 510 萬。在 1974 年以前，殖民地政府依賴與中國內地定立移民配額協議，但仍未能阻止難民潮。1974 年 11 月，香港政府實施「抵壘政策」，試圖限制移民潮。「抵壘」的非法入境者如獲得親屬接待或以其他方式在市區找到適當住宿，將被允許留下，但在邊境被逮補的將被遣返。該政策並不成功並在 1980 年 10 月終止，此後所有沒有香港身份證的移民如被逮捕將被遣返。

6. 蔡寶瓊編（1998 年），《晚晚 6 點半 -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http://www.stepforwardmultimedia.com/book.php?isbn=962-8326-17-1（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21 日）。

7. Janet W. Sallaff 在 1981 年出版了一本廣受讚譽的書，名為《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香港工作女兒），是有關 28 名屬低收入家庭女性的工作女兒研究，「工作女兒」的說法由此而來。

8. 見註 2。

9. 同上。

10. 見註 3。

11. 政府計算的生育率，包括母親來自內地而父親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一類嬰兒活產嬰兒數目，但不包括父親和母親都是來自內地的第二類嬰兒。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0 年），《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lication/stat_report/population/B1120015042010XXXXB0100.pdf（瀏覽日期：2012 年 8 月 3 日）。

12. 見註 2。

13. 譚少薇（2003 年），「Empowering Mobility: "Astronaut" Women in Australia」在李詠怡編的《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s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archy》，第 97-132 頁。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14.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性別與社會流動研究建基於在 1994 年至 2010 年間向 39,629 香港人進行的調查。事實上，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調查人數不止於此，其他調查針對特定子人口如功能界別議員、示威者和那些具有加拿大公民資格。以電話進行調查，並根據受訪者喜好選擇廣東話、普通話、客家話和英語。住戶受訪者以隨機表隨機抽出，通過住戶中年滿 18 歲的人數配對最後一位撥出數字。

15. 與人口普查不同，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調查只包括擁有居港權的香港居民，意味受訪者曾在香港連續

居住至少七年。明顯被排除的群體包括新移民和外籍家庭傭工。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就那些在中國大陸出生的也略為代表性不足（1994 年至 2010 年調查中的 25.5%，相比 2001年、2006 年和 2011 年人口普查平均為 28.9%），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排除了 18 歲以下人士。

16. 就共2萬名受訪者的圖表中，誤差範圍在95% 置信區間為+/- 0.4 至+/- 0.7%，取決於在分類中的精細度。就共 4 萬名受訪者的圖表中，誤差範圍是+/- 0.3 至+/- 0.5%。

17.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2012 年），「香港便覽—入境事務」，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immigration.pdf（瀏覽日期：2012 年 11 月 14 日）。

18. 思匯政策研究所（2010 年），《坐言起行：關於香港空氣污染的民意調查 2010》（只有英文版），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0/12/LessTalk-Full.pdf（瀏覽日期：2012 年 11 月 14 日）。另見戴高禮 2008 年），《Silent Epidemic: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2008》（只有英文版），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live/upload/files/200901SilentEpidemic.pdf（瀏覽日期：2012 年 11 月 14 日）。

19. 請參閱報告全文。戴高禮（2013 年），《轉變中的香港：1994 年至 2010 年女性在社會和國家的境況》，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

思匯政策研究所 2013 年 2 月
本報告發表的意見僅代表作者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思匯政策研究所的立場。

思匯
CIVIC EXCHANGE

香港中環永和街 23-29 號俊和商業中心 23 樓
電話 （852）2893 0213 傳真 （852）3105 9713 www.civic-exchange.org